

总第35期  
2015年05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把抗战历史当作最好的“教科书”  
“营养剂”和“清醒剂”

“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

——我党20世纪70年代初期陈云的对外经济工作思想

红军渡

徐向前  
一九四三年

20世纪末四川扶贫攻坚（1978—2000）（上）

# 四川党史

SICHUANDANGSHI

准印证号：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第01-012号

#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1945-2015

## 我省举行座谈会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9月7日上午，我省举行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动员和引导全省人民牢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凝聚力量、开创未来，积极投身“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川实践，为谱写中国梦四川篇章而努力奋斗。省委书记王东明出席座谈会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柯尊平出席。

省委常委、秘书长吴靖平主持座谈会。省领导李登菊、刘家国、崔保华、陈光志、曲木史哈、杨兴平，武警四川省总队政委高凯，省直有关部门(单位)、部分群团组织和高等学校负责同志，抗战老战士、老同志代表和抗日英雄子女代表，省军区和武警四川省总队官兵代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在蓉社会各界、青年学生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 2015·四川省暨成都市公祭烈士活动举行

9月30日是全国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2015·四川省暨成都市公祭烈士活动在成都烈士陵园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明，成都军区政委朱福熙，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省政协主席柯尊平，省委副书记尹力，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等出席活动。



9月30日，2015·四川省暨成都市公祭烈士活动在成都烈士陵园举行。

四川日报记者 毛漫丁 田为 摄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面对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倡导并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中华儿女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英雄的四川人民战斗在抗击侵略者的各个战场，朱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川籍共产党将领驰骋疆场，300多万川军将士出川抗战。作为抗战大后方，四川人民也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努力奋斗。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伟大的抗战精神贯彻到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各项工作之中，同心合力推进“两个跨越”，奋力开创四川美好未来。

——摘自省委书记王东明在四川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上的讲话



# 四川党史

SICHUANDANGSHI

2015年05期

/总第35期

## 主管主办: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 名誉顾问:

谢世杰 秦玉琴 陶武先 席义方

## 顾问:

陈荣仲 吴得民 卢耸岗 陈文书  
赵庆东 罗宗荣 张继禄 彭亚新  
龚自德 王庭科 彭穗宁 王光华  
侯德邻 张国新 鲜于浩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

王承先

### 副主任:

李文星 江红英 郭生春 宁志一

### 委员:

周锐京 戴忠东 王皓 杨吉成  
魏家骏 彭本瑜 邱俊 江红颖  
谭洪明 唐广生 向道泉 余崇威  
雷家兴 唐宗政 李勇 侯立新  
蒋吉平 师伟 徐永利 秦后权  
肖飞 张敏 尹克发

## 封面:

广元苍溪红军渡纪念雕塑

## 封二:

①我省举行座谈会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②2015·四川省暨成都市公祭烈士活动举行

## 封三:

①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应邀来川作专题辅导报告

②四川党史界抗战系列书籍在蓉首发

## 封底:

雅安石棉安顺场今貌

## 卷首

- 01 四川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上的讲话摘选

/王东明

##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专题

- 04 把抗战历史当作最好的“教科书”“营养剂”和“清醒剂”

/王承先

- 08 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党的事业成功的保证

/江红英

## 专题研究

- 17 四渡赤水与北渡长江——兼论长征史诗的江河元素

/宁志一

- 23 “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浅谈20世纪70年代初期陈云的对外经济工作思想

/董振瑞

## 人物春秋

- 28 王维舟与延安大生产运动

/王荣成

- 31 朱自清先生在叙永县作抗战演讲

/颜林

## 改革开放实录

34 20世纪末四川扶贫攻坚(1978—2000)(上)

/曾凡荣

## 学术动态

40 四川党史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9·3”重要讲话精神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座谈会综述

/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

## 红色之旅

44 巴中市通江区

## 基层手记

46 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

/宋升堂

## 动态窗口

47 大型画册丛书《图说长征》课题工作协调会在京召开

全国党史期刊编辑培训班在京举办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文星赴四川大学开设党史教育国情讲座

全省各市(州)党史界积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9·3”重要讲话精神

广元市委书记马华同志对党史工作作出批示,肯定市委党史研究室今年以来取得的显著成绩

《赵一曼图录》正式出版发行



刊名题签：何应辉

### 编辑出版：

《四川党史》编辑部

### 责任编辑：

蒲志明 马睿 李晓聪

### 美术编辑：

《廉政瞭望》杂志社

●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商业后街3号

● 邮编：610031

● 电话：028-86603140

● 传真：028-86603140

● 电子邮箱：scds.2007@163.com

● 网址：www.scds.org.cn

● 准印证号：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第01-012号

● 印刷单位：四川川林印刷有限公司

● 印刷日期：2015年8月

● 印数：2000册

● 发送对象：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各省(区、市)党史工作部门,全省各级党史工作部门,省级各机关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把抗战历史当作最好的“教科书”“营养剂”和“清醒剂”

文/王承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始终贯穿着“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这样一条红线。这不仅是今年系列纪念活动的主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待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科学态度，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把历史当作最好的“教科书”“营养剂”和“清醒剂”，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思想自觉。作为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既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弘扬抗战精神的需要，更是坚持科学历史观推进深化抗战历史研究和资政育人的需要。

### 一、认真学习习总书记“9.3”重要讲话精神，正确认识中国抗日战争及其胜利的重要意义

第一、作为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惨烈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人员牺牲最多，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有效牵制了日军主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遏制了日军“北上”“南下”“西进”计划，使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粉碎了德意日瓜分全球、称霸世界的战略图谋；作为亚太地区盟军的重要战略支点和后方战略基地，它为同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有力支援了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斗争。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是抗战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力量，是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共既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抗击者，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倡导者、促成

者、维护者；它既是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鼓舞者和坚强的政治核心，也是抗战正确战略的提出者、指导者和引领者，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 第三、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转折点。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百年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纵观中国历史，这场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点：它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这种巨大的民族觉醒和空前的民族团结，从根本上决定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决定了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它极大地加快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步伐。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自觉地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反对专制统治结合起来，把积极抗日与推进民主进步运动结合起来，把为中国人民谋民族解放与谋社会解放结合起来。国共双方在抗战中政治力量的消长和人心的向背，直接影响了战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进而决定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抗日战争的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 二、回顾四川抗战历史，始终铭记四川为抗战胜利所作的贡献和牺牲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四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号召的引领下，纷纷投身抗日救国的洪流。红军北上抗日途经四川时，四川人民踊跃参军、积极支援红军。而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四川人民更是自觉承担起了抗击日寇侵略、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倾其所有，成为了夺取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主要力量之一。

其一、四川人民为抗战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是相当巨大的。

四川作为战时中国的大本营，不仅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也是中国战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中心，更是中国抗战主要兵源、粮源供给地，是战时中国各项军需、民用物资生产的重要基地。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之秋，四川人民义无反顾，慷慨赴难，对全国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四川是日军飞机轰炸最为猛烈、损失最为惨重的内陆省份。全省共有66个市、县(区)遭到日机前后超过300天的轰炸，超过当时全省市县总数的三分之一。日机的轰炸造成了四川人口的重大伤亡和财产的巨大损失。

——出兵最多。八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征兵总数1400多万，四川出兵总计约340万人，占近四分之一。川军将士以简陋之武器和装备抗击精锐日军，为民族求解放，国家争生存，付出了血的代价，伤亡、失踪64.6万余人，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位居全国之首。

——出钱最多。抗战期间，全国大部分省市沦陷，四川成为国民政府财政开支的重要来源。四川负担了8年抗战国民政府总支出的近三分之一。

——出物最多。为了保障抗日军粮的供应，四川人民节衣缩食，一日两餐，交纳沉重的田赋。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5年之间交纳稻谷8228.6万石，占全国征缴稻谷总量的38.57%。四川各地的工厂加紧生产，为抗日前线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服装和其他各种物资。

——出力最多。为了建设巩固的抗战大后方，超过300万四川民工为修建庞大的军事设施、战备工程，为保障抗战运输通畅，献出了辛勤的汗水甚至宝贵的生命。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战略地位和作用特殊。作为中国抗战最重要的大后方，四川不仅是国民政府战时首都所在地，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指挥部。抗战中修筑的四川机场在盟军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津机场是二战时期亚洲

最大的重型轰炸机航空机场，也是当时全国的第二大机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飞虎队）曾进驻。1944年6月16日，一批美军B-29轰炸机从川西机场呼啸起飞，对日本本土的重要军工设施进行重点轰炸。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基地直接长途奔袭日本，意义重大。

**其二、四川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身处抗战大后方的中共四川组织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南方局的直接指挥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领全川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亲自关心和指导下恢复和重建的中共四川组织在抗日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党的基层组织遍及全省各地，成为推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深入的坚强的政治领导力量。四川各级党组织在建立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川军停止内战、出川抗日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和影响作用。同时，在敌后战场，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川籍英豪更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直接奔赴抗日前线参加对日作战，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他们中，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师政委邓小平，八路军115师政委聂荣臻，新四军军长陈毅，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罗瑞卿，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等。这些川籍共产党高级将领，率部不畏强暴、奋勇拼杀，与凶恶的侵略军进行了无数次殊死血战，直至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川籍共产党人中，还涌现出了许多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抗日革命英烈，赵一曼、陈修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其三、四川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作用和贡献是中国共产党抗战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抗战之所以能够坚持并最终取得胜利，原

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四川这个稳固的大后方作为重要战略支撑。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四川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川军出川抗战，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为八路军、新四军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对建立稳固的抗战大后方作出了重要贡献。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有力例证。中共四川组织发挥的这些作用历史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深化抗战研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营养剂和清醒剂**

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抗战研究。四川抗战历史的研究通过几十年党史部门、高等院校、社科研究机构等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发表、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但仍存在研究不深的问题。我们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前夕集中编纂出版《四川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抗战时期的中共四川组织》和《抗日英烈陈修文》，就是希望对进一步深化四川抗战历史研究起推动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党史工作资政育人的职能。

**一是坚持用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化抗战研究特别是四川抗战史研究。**

深化抗战研究要求我们要具有世界视野。我们不仅要把中国抗战放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去研究，也要把四川抗战放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要重点研究四川在全国抗战及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和地位、四川作为中共统一战线策略成功实践地的历史经验、中共四川组织与四川对抗战胜利所作贡献的关系等问题。要注重和加强比较研究。要对抗战战争的每个阶段中日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力量进行对比研究，要对国共双方对人民的态度以及抗战所采用的

战略、方针、政策进行对比研究，还要把敌后根据地和后方抗战活动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对比研究，往往可以得出更为深刻准确的历史结论。要具有正确的史识，并把研究和宣传有机结合起来。加强本土抗战人物、主要事件和全民抗战历程的研究。对抗日英烈挖掘其爱国主义精神，对抗战老兵抢救口述史料，对敏感的事按中央的结论形成，对抗日民主党派研究其历史进步作用。

### 二是深化抗战研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历史的营养剂。

习总书记重要讲话不仅对伟大的抗战精神作了四个方面的精辟概括，也揭示了正义、和平、人民“三个必胜”的历史真理。深化抗战研究，就是在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丰富的历史的营养剂。首先我们要深化对历史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以正义战胜邪恶、和平战胜侵略、民主战胜专制而宣告结束。史影幢幢，正义或许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和平是正义胜利的必然结果，而人民是正义的强大支撑。用对历史真理的认识强化我们道路、制度、理论“四个自信”。其次要对如何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进行研究。伟大的抗战精神，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精神动力，也是我们党史研究一座挖不尽、用不完的巍巍精神富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汇聚了全民族的力量才取得的，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同样需要全民族的团结奋斗。在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今天，我们要深入研究抗战精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时代体现，研究中华儿女如何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为实现民族复兴攻坚克难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源泉。再次要深化对抗战时期中共四川组织发展壮大的历史研究。中共四川组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超常规的迅猛发展，出色地完成了历史使命，为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启示。深化四川抗战史研究，就是要总结好历史的宝贵经验，结合四川当前实际，为省委提供加强

执政党建设方面的资政服务。

### 三是深化抗战研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历史的清醒剂。

70多年前的中日战争，是落后的农业国同领先的工业国之间的较量，再次印证了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血的历史教训。在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人类头上的今天，我们必须居安思危，以史为鉴，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深化抗战研究，就要吸取历史教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历史的清醒剂。日本一个弹丸小国竟敢悍然发动全面侵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依仗其先进的生产力。历史告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们必须努力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核心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力争进入世界领先水平。日本敢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中国处于一盘散沙、吏治不彰、官民异心的分崩离析状态。历史告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历史还告诉我们，必须拥有一支能够捍卫世界和平、保护人民的强大军队。强大的国防力量是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钢铁长城，是维护世界各地中国公民合法权益的坚强保障，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铿锵有力的话语，表达了我们中华民族对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决心。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化抗战研究，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将伟大的抗战精神转化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特别是推动省委治蜀兴川战略的强大精神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不断以新的更大胜利告慰曾为之奋斗过的英烈们的忠魂！

（本文为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承先在四川党史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9.3”重要讲话精神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 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是党的事业成功的保证

文/江红英

什么是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概括地说，党的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党的政治规矩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政治规则、组织约束、优良传统和工作习惯，既包括成文的纪律，也包括自我约束的不成文的纪律，其中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sup>①</sup>。党的90多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sup>②</sup>，是党的事业成功的保证。

### 一、党的领袖历来十分重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无产阶级政党的特质表现在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上。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的领袖们无一不反复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党的领袖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极为重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指出：“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sup>③</sup>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的科学论断。这次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制定并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和纪律的

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和纪律的决定》。1948年11月，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在西柏坡题写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刘少奇作为党的领袖，对于党的政治纪律也有丰富的论述。他1939年7月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所做著名演讲《论共产党的修养》中，要求共产党员“在思想、言论、行动上严格地约束自己，特别是对于同当时革命斗争有关的政治思想、言论和行动，要用严格的立场和正确的原则来约束自己。”<sup>④</sup>陈云作为党的领袖，也十分强调党的政治纪律。1940年3月19日，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发表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讲话，强调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必须无条件遵守：“个人对组织，少数对多数，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服从是无条件的。组织、多数、上级、中央的决策正确时，自然要服从；如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怎么办？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同时应该按党章规定的权利，提出建议，或保留自己的意见。”<sup>⑤</sup>“‘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这是我们党的铁的纪律，也是健全党内生活、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sup>⑥</sup>

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的形势和环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但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认识，党的领袖们从未有变。朱德是党的历史上、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0年5月6日，他在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联席会议上作了题为《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讲话。他指出：“党的二十八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在党内坚持铁的纪律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党内没有纪律，或者不坚持执行党内

纪律，那我们的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无法率领千百万群众去进行胜利的斗争，取得象今天这样巨大规模的胜利”，“继续在党内坚持铁的纪律，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性，以保证全党的统一与集中，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事情”。<sup>⑦</sup>

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遭遇重大挫折时，党的领袖们都会反复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如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报告中，针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阐述了党的政治纪律：“我们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如果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就不可能进行任何一个胜利的战斗。在中央同地方的关系上是这样，在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上下级关系上也是这样。一切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现象的存在，都削弱了党的统一和集中，因此都必须坚决反对。”<sup>⑧</sup>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人民开辟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但党的领袖们依然十分重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1980年1月16日，针对“四人帮”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残余，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所谓“民主思潮”，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他指出：“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sup>⑨</sup>在当年12月2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强调：“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这一点现在特别重要。谁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的纪律处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把这一点作为当前的重点。”<sup>⑩</sup>

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袖都十分重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江泽民多次强调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要“讲政治”。他指出：“在我们党内，决不允许存在超越于党组织和党的纪律之上、不接受监督的特殊人物”<sup>⑪</sup>，“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

场、政治观点，严守政治纪律，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保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高度统一”。<sup>⑫</sup>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期间，在中央纪委全会上多次强调党的政治纪律问题，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切实保证政令畅通，并对党员、干部提出了“六个决不允许”：决不允许在群众中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决不允许公开发表与中央的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决不允许对中央的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决不允许编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决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泄露党和国家的秘密。他说：“如果大家对中央三令五申的禁令和规章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我们这个党就会被搞散，我们这个国家就会被搞散，哪里还谈得上同心同德、万众一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sup>⑬</sup>

总之，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的任何历史时期，党的领袖都毫无例外，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视为党的生命，视为党的事业成败的条件与保证。

## 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制定途径及形式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出特定的内容。这些形式和内容既是历史的，又是具体的，换言之，针对不同历史阶段，有着具有时代特色的内容。通过召开党的会议制订党章党规是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最为普遍的形式，从党的一大到党的十八大，概莫能外。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及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中，包括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内的党的纪律始终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历届党中央均不定期召开中央全会或其他会议讨论党的建设问题，其中关于党的纪律建设亦是重要内容。纵观党的历史，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主要从以下三类党内规章中体现出来。

一类是党内法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党章，党章是党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求的总体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sup>⑧</sup>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制定党章，第一部党章是党的二大制定的。根据形势任务变化的需要，二大之后历次代表大会（五大除外）均对党章作出过不同程度的修改。现行党章是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修改制定的，其中专门恢复了“党的纪律”一章，把加强党的纪律放在重要位置。到党的十八大，党章已进行了第16次修改。党章中第二章《党的组织制度》、第六章《党的干部》、第七章《党的纪律》，均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有着详细规定。

除了党章，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党组织和党员遵守党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接受监督、严明党纪等方面确立了规矩、提供了遵循。2003年12月31日中央正式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党内法规，也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出了规定。

另一类是党代会和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定或决议中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前的党代会在许多决议中都有关于政治纪律的规定，如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对党的纪律有明确要求，1927年5月党的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即使用了“政治纪律”这一今天普遍使用的专有名词。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也均有政治纪律的相关论述。历次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或决定中，与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密切相关的文件大致如下：

时 间	会 议	通过的决议或决定
1938年11月	六届六中全会	《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 《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
1954年2月	七届四中全会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1980年2月	十一届五中全会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1983年10月	十二届二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1989年6月	十三届四中全会	《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1994年9月	十四届四中全会	《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2001年9月	十五届六中全会	《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2004年9月	十六届四中全会	《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2009年9月	十七届四中全会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4年10月	十八届四中全会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还有一类是针对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情况，党中央或党中央各机构，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等对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专项规定。如1948年1月7日，全国解放胜利的大局已经确定，这就要求党必须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的军队内的任何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为此，中央采取了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的举措。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强调：“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各中央局和分局是受中央委任、代表中央执行其所委托的任务的机关，必须同中央发生最密切的联系。”<sup>⑤</sup>又如2003年中央纪委发出的《关于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不准听信、传播政治谣言的通知》。

### 三、强化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点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铁的纪律，从党成立之始即植入党的肌体，扎根在党员干部脑中。回顾党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历史，重点内容有相应的集中体现。

#### 1. 关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性

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写道：“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sup>⑥</sup>这一文件已明确指出了纪律与党的革命活动之间的关系，没有严格的纪律，党就没有战斗力。1927年5月，党的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即明确使用“政治纪律”一词，并强调要“加强党内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sup>⑦</sup>当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重申了党的五大的要求：“本党第五次大会对于党内政治纪律的整顿，非常主观，只有最严密的政治纪律，才能够增厚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力量，这是每一个共产党所必需的最低条件。”<sup>⑧</sup>党的五大不仅强调党

的纪律，而且更加强调党的政治纪律，把政治纪律的重要性与党的力量的增强联系在一起，与党员的起码标准和义务联系在一起。

此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重要性的规定，一直保留在党的各种法规中。在2012年十八大修正后的党章里仍然明确：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

#### 2. 关于政治方向、立场与言行绝对服从中央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党章即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须绝对服从之”，“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sup>⑨</sup>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也明确指出：“一切定期的或其他的报纸与出版物，须完全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无论他是合法的或违法的，决不许出版机关任意自主，以致引出违反本党的政策。”<sup>⑩</sup>1945年党的七大党章规定：“凡关于全国性质的问题，在中央没有发表意见和决定以前，各部分和各地方党的组织及党的负责人，除自行讨论及向中央建议外，均不得自由发布意见和决定。凡关于地方性质的问题，党的地方组织有自主决定之权；但不得和中央及上级的决定相抵触。”<sup>⑪</sup>

绝对服从中央的前提是中央决策是正确的。为确保中央决策的正确，党在不同时期也有相应规定。1927年6月1日，在大革命失败、党面临着严峻生死关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这个党的历史上唯一不是由党代会修正的党章明确规定：“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党部机关之决议，应当敏捷的与正确的执行之，但对于党内一切争论问题，在未决定以前，得完全自由讨论之。”<sup>⑫</sup>后来的党章均有相应规定，如七大党章规定：“党的政策及各种问题，在未经决

定以前，每个党员在党的组织内及党的会议上，均可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一经决议以后，即须服从，并须无条件地执行。”<sup>⑳</sup>十八大党章也规定：“有关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各部门、各地方的党组织可以向中央提出建议，但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sup>㉑</sup>

### 3. 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与维护党的团结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新中国第一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在阐述党的政治纪律时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原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所强调和坚持的原则。经验证明：这是克服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防止党的个别组织和党员向党闹独立性，防止分散主义，减少或避免各项工作中可能发生的错误的重要环节。”<sup>㉒</sup>自1928年党的六大明确了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以来，民主集中制同时也成为党的政治纪律的必然内容。发扬党内民主，是通过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体现出来，目的是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实现正确的集中。一旦形成正确的集中，全党则必须团结统一、行动一致，以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

民主集中制的核心内容是“四个服从”。“四个服从”是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在党章中逐步完善的。党的五大之前，党章虽然有相应的内容，但没有形成统一或规范的与要求说法，内容上涉及到党员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五大的党章涉及到少数服从多数。针对长征中张国焘分裂党的事件，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强调“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sup>㉓</sup>七大党章对“四个服从”有了基本完备的表述：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延续至今，“四

个服从”规范为：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 4. 关于模范遵守法规与服务群众

党的成文规定中，对党员的标准和要求均有包含了模范遵守法规、时刻服务群众的内容。党的不成文的许多规矩做法，也为后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严守党的政治规矩中留下了传承的内容。

早期共产党人恽代英曾在1926年撰文《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他认为：“要能够很忠实的接受党的训练，严格的服从党的纪律，要能扫除一切在封建社会或买办阶级文化的社会中所养成的错误思想，养成功一个彻头彻尾的布尔塞维克的精神，切实负责将党的意见散布到各种群众中去……要固执错误的思想，不受党的训练，对于党的意思怠工，不肯传布到群众中去的人，根本不合于做共产党员，应当将他们踢到共产党的门外去。”<sup>㉔</sup>恽代英的这篇文章，很清楚地告诉共产党员，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中，规定了党员必须与群众紧密联系，做群众工作，服务群众。

事实上，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性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党诞生起，始终写在党的章程之中，这就要求党员以此为出发点，模范遵守党内法规、国家法令，全心全意服务群众，从而也使得上述内容成为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并体现在党的文件之中。如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4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明确要求：“一切党员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积极地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建设工作，并在人民群众中起模范作用。对于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否则，就不能作一个共产党员。”<sup>㉕</sup>60多年后，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样指出：“党的纪律是党内规矩。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 四、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证了党不断走向胜利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对党组织和党员的刚性约束。但党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每个党员自身素质、能力、水平以及所处的外部环境不一样，对党的认识、对理想信念的认识有所不同，或发生变化，由此，党的历史上也不乏违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党员领导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远至张国焘、近至周永康等。因此，党从早年起，就在自己的章程中规定了违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所该受到的处罚。发展至今，党对违纪的处分按程度区分为五种：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在党的历史上，正是因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才保证了党渡过各种难关、战胜各种险阻，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

#### 1. 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证了党中央的团结统一

在党的历史上，党中央出现过不止一次的分裂危险。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共产国际扶持操纵下，没有多少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的王明被直接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引起了党内一些同志的强烈不满。时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的罗章龙召集党内一些力量，公开发表反对六届四中全会的声明，并相继发起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由罗章龙任书记。1月27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和《关于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凤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决议案》。随后，中央政治局又宣布开除王克全等人的党籍。罗章龙等人策划的“第二中央”事件，使党面临着一场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央政治局果断处理，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

党中央面临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是张国焘的分裂活动。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胜利会师。对下一步的行动部署，党中央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而张国焘却认为北上必须和战斗力很强的国民党主力胡宗南部正面作战，因此主张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去发展，以减少军事压力。为统一思想，中共中央连续召开多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等系列文件，确定两军会晤后迅速北上。但张国焘却出尔反尔，违背中央决定，以各种理由拒绝北上，甚至公然向党要权，要求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在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后，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南下，并作出《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定》，宣布另立“党中央”，自任“主席”，公然分裂党。中共中央坚决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进行了灵活坚定的斗争，于1936年1月22日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于1937年3月31日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在张国焘叛党后，于1938年4月18日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严肃执行了党的政治纪律，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在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重大事件。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1954年2月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明确规定：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必须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决议，将高岗、饶漱石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党中央领导全党对这次危害党的团结的行为进行的斗争，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受到深刻的教育，党中央从延安整风和七大以来所形成的坚强团结得到了巩固。

改革开放以后，党在中央的团结统一上同样严

守铁的纪律。1989年春夏之交，正当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之际，北京发生了引起社会极大震动的政治风波，直至发展到动乱、暴乱。一些人的活动实质上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在认识上、言论上、行动上与中央发生了分歧。中央在果断平息事态之后，于6月23日至24日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随后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又撤销了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 2. 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证了党组织的纯洁坚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即肩负了重大的历史责任，这就要求作为党的组织细胞的党员要保持思想、政治、作风的纯洁，如此，党组织才能坚强有力，党的事业才能不断推向前进。对于思想、政治和作风不纯的党员，党有纪律的约束。其中，对于违反政治纪律的党员，党组织坚决予以处罚，以保持党的纯洁。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明确指出：“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一）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党纲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决议；（二）无故连续二次不到会；（三）无故欠缴党费三个月；（四）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五）不守纪律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六）泄漏本党秘密。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sup>②</sup>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就是因为公然违背党的纪律、擅自脱离组织，中共中央按照党章规定给予严肃处理，分别先后开除了二人的党籍。

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中也明确规定：“严格的整饬纪律和建立党的秘密组

织，实在是党的工作成效之最必须的条件之一，对于违背组织上政治上的纪律的分子，必定要严厉的处分。……凡是稍稍破坏党的秘密组织纪律的，立刻应当停止他的工作，或者简直开除党籍。”<sup>③</sup>

破坏党纪最为恶劣的行为是叛变党组织、出卖革命同志。在土地革命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叛变就意味着党员和党组织面临灭顶之灾。为了惩罚叛徒，党中央1927年至1935年在上海成立的特别行动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采用暗杀方式惩罚叛徒，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维护党组织的安全。

即使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党对组织的纯洁要求也从未含糊，整顿党组织的工作也从未松懈，其中是否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就是纯洁党组织的一项铁的标准。1939年5月23日，陈云在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73期发表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叙述了刘力功在抗大毕业后，党组织决定派他到基层工作，他不服从安排，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回原籍工作，否则就退党。党组织认为他“非常自高自大，有不少共产党员所不应有的观点”。为了帮助刘力功，陈云和党组织曾先后七次找他谈话，强调了去基层锻炼的重要性，最后一次谈话的时候明确告诉他，“个人服从组织，是党的纪律，要你去华北基层工作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此时的刘力功仍然拒绝执行党的决定。为此，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并公布于全党，原因即在于“党的纪律不容任何人破坏”。<sup>④</sup>一个星期后，在1939年5月30日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一文中，陈云说：“一个共产党坚决地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是他的义务。他不仅应该与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而且要着重与自己的一切破坏党纪的言论行动作斗争，使自己成为遵守党纪的模范。”<sup>⑤</sup>

## 3. 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证了党的政治目标得以实现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都有不同的政治目标。从宏观上说，实现共产主义是所有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从中观上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党就

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党的政治目标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开放阶段，党的政治目标就是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微观上说，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对党最近、最新阶段的政治目标有着明确规定，如目前全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正在进行的实现全面小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了保证每个阶段党的政治目标得以实现，党就必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尤其要保证全党行动的一致性。

1934年1月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对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曾评价：“在党的领导之下，红军已经在行动上达到了高度的配合，这是由于红军战士的明确的阶级意识，自觉的铁的纪律，组织与战斗经验的丰富，政治与军事领导之改善与加强。”<sup>③</sup>这一评价实质上揭示了铁的纪律保证了行动的一致性，从而也保证了政治目标的实现。一旦出现行动不一致，将会导致党在某一阶段的政治目标难以实现之时，党中央必然会突出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如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老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后，各地在执行中央决策时出现差异，对此，1948年4月17日中央指示：“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sup>④</sup>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1948年5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中又强调：“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sup>⑤</sup>

针对党员对组织决定存有疑虑或持有不同意见的情况，党章规定了党员个人可以通过正当渠道反映，但行动上则必须执行党的决定。刘少奇1937年5月在延安曾对此有如下阐述：“党有纪律，不表现在不许同志向党内发表不同意领导机关的主张，而表现在同志虽有不同的主张，还能在行动上

服从多数与执行领导机关的决定。”<sup>⑥</sup>以毛泽东为例，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央苏区，他曾被剥夺党内和军内的领导权，虽然历史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在党的决定已经做出的前提下，毛泽东只是保留了个人意见，而行动上则服从中央的决定，同时通过党内渠道积极反映自己的意见，最终在遵义会议上使自己的正确意见得到采纳，维护了大局和团结。邓小平的一生有过“三落三起”，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错不在他个人，但就他个人而言，首先是在行动上服从党的决定，再将他个人的意见通过正当程序反映给党中央。

#### 4. 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证了党的事业赢得民心

与党的政治纪律的内涵有所区别，党的政治规矩主要是指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些优良传统包括实事求是的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等。作为政治规矩的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在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过程中积累和总结出来的，同时也正是依靠这些政治规矩，为党赢得了民心。

1928年下旬，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过程中，毛泽东向工农革命军部队颁布“三大纪律”，即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即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发展完善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人民军队的纪律，实质上也是党的纪律，为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还强调了党内一条重要的规矩——“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正是因为有这些党的政治规矩，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赢得人民群众的

拥护。正如194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中所阐释：“如果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并取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忠心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末，我们就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不能保持已得的胜利。”<sup>④</sup>

总之，中国共产党90多年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充分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纪律和规矩得到充

分尊重和严格执行，党的团结统一就有保证、事业胜利就充满希望；什么时候党的纪律和规矩遭到践踏和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就受到威胁，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就大打折扣。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是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法宝，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的可靠保证。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 参考文献

- ① 《人民日报》2015年1月14日，第1版。
-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页。
-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 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
- ⑤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
- ⑥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页。
- ⑦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9、280页。
- ⑧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7页。
- ⑨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 ⑩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6页。
- ⑪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7页。
- ⑫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1页。
- ⑬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56页。
- ⑭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 ⑮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5页。
- ⑯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
- ⑰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7/4428300.html>
- ⑱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2页。
- ⑲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4/4428163.html>
- ⑳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142页。
- ㉑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9/4442095.html>
- ㉒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页。
- ㉓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9/4442095.html>
- ㉔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2/1119/c234123-19618241-3.html>
- ㉕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7页。
- ㉖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 ㉗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5页。
- ㉘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193页。
- ㉙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页。
- ㉚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0页。
- ㉛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
- ㉜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
- ㉝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
- ㉞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页。
- ㉟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2页。
- ㊱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
- ㊲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5页。

# 四渡赤水与北渡长江

## ——兼论长征史诗的江河元素

文/宁志一

红军长征时期敌我双方常以江河作为攻防的重点，跨江渡河成为红军长征中的常态。北渡长江是与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本文将对四渡赤水与北渡长江关系，作一论述。同时论及长征史诗中的江河因素。

### 北渡长江计划的形成及初步实施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得以参与中央的重要决策。但中央红军获得的喘息机会是短暂的。蒋介石急调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湘四省兵力及广西军队一部，共约150余个团，从四面八方遵义地区进逼。

红军何去何从又一次现实地摆在了党的面前。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均为四川人，二人在遵义会议上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二人从多方面论证了四川建立根据地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遵义会议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在相关决议中提到：“遵义一带地形条件不好，北有长江，东、南有乌江，西有横江和横断山脉，不利于红军大规模机动作战；当地党的工作基础薄弱，群众吸食鸦片比较普遍，红军难以扩大。”于是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朱德、刘伯承还建议选择在宜宾与泸州之间的江面作为渡江点，因为这段江面较宽，流速较缓，利于大部队渡江。

遵义会议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团首长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拟定：中央红军各部进至赤水、土城附近地域后，分3路纵队由宜（宾）泸（州）间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1

月19日，红一、三、五、九军团分三路出发向土城、赤水前进。

就在遵义会议确定红军北上入川的同时，川军也在重庆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研究防堵红军入川的部署。川军判明红军渡江企图后，下大力整固长江防务，布防于南北两岸的总兵力前后达到了43个团。川军沿江广筑工事、碉堡，实行坚壁清野，严密封锁渡口、道路。

土城位于贵州西北，是赤水东岸的重要渡口，是黔北大道要冲。红军先于川军占领了土城。这期间，川军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三旅郭勋祺部、独立旅潘佐部和模范师第三旅廖泽部先后进抵土城以东地域。27日，郭勋祺部尾追红五军团，红军节节抵抗退至土城东之青杠坡。

军委为给川军郭勋祺部以决定性打击，扫除渡江障碍，决定集中全力发动总攻。中央负责军事指挥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在白马山设立指挥部。总参谋长刘伯承到五军团直接指挥。28日拂晓，在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指挥下，五师向青杠坡敌右侧突击，四师主力向青杠坡背后攻击。郭勋祺旅和潘廖两旅依据险地、工事进行顽抗，并在优势兵力火力掩护下，步步向土城镇进逼，一直打到镇东白马军委指挥部前沿。这一仗是遵义会议之后红军进行的第一次大战役，成败关系全军士气，朱德亲自上前线指挥。恶战中险情环生，董必武、林伯渠及邓颖超、贺子珍等所在的干部休养所连撤退时遭敌火力拦截，幸被干部团救援方化险为夷。朱德总司令也是在一个排的掩护下，才仓促撤退出前线阵地。土城之战红军的总攻变成了川军的反攻，进攻作战变成了背水作战，前有敌军猛攻，

后有波涛滚滚的赤水河。军委决定立即撤出战斗。

土城之战失利，主要原因在于轻敌。过去中央苏区的一些文件、报刊，在宣传上过分贬低川军，认为普遍吸食鸦片，是“双枪兵”；长征进入贵州后，沿途见到黔军稍战即溃，更加深了这种印象。红军误判川军投入土城之战的兵力为4个团，但实则为9个团。刘湘对部队的管束非常严格，部队中绝不允许吸食鸦片；而且川军的武器精良，装备较好，配置有飞机、舰艇、战车和火炮，两个机枪团全配清一色的路易式机枪。

土城一仗红军的伤亡高达4000多人，没有达到预期目的。1月29日凌晨3时，军委发出了一渡赤水的行动部署：“我野战军拟于今二十九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29日拂晓，全军按照部署，分三路从猿猴（今元厚）及土城上下游渡口开始渡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开进。

## 四渡赤水的进程

红军土城之战失利说明，直奔长江是不现实的。因此一渡赤水后中央决定建立川滇黔边根据地，二渡赤水后中央决定建立黔北根据地，从当时红军长途征战，急需休整的状况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和北过长江计划并不矛盾。随着中日矛盾的上升，长江以北更利于中国革命的开展。长江以北，还有另一支革命的重要力量红四方面军。无论从革命发展的大势，还是革命军事力量的整合，党中央、红一方面军北渡长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只不过是何时、从何处过江的问题。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右岸一级支流，红一方面军来回四次渡河，最终摆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北渡长江。

### （一）一渡赤水暂时放弃北渡长江

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红一军团于2月2日进攻川军严守的永宁城（今叙永县城），仍寄希望打开北进长江通道。叙永县城分东西两城，城垣坚固。红军对东西两城发动猛烈攻击，但仍不能攻入

城内，4日红军撤回。

攻击叙永受挫，何去何从又一次成为红军的首要问题。2月6日，军委电告红一、三军团：“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因此我一、三军团今6号前进地点应向扎西靠近。”这一电报表明当时军委要求立即渡江的态度已经基本转变，而选择在川滇边境建立根据地，以便以后随时寻机渡江。

2月10日，从破译的电报中得知敌军正从南北两面逼近扎西，军委下令部队立即“转移到娄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与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这一命令表明军委已经决心回师二渡赤水。11日，红军分三路由扎西秘密回师东进。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之后，由于敌情变化，不能按计划渡过长江，红军在滇东北之扎西（今威信）集结。此后各路敌军向川滇边界扑来，企图压迫红军决战。这时红军北渡长江已不可能，就地扎根也站不住脚。当时毛泽东看到敌人大军压境的不利形势，又看到了对我军的有利条件。这就是敌军为阻止红军北渡长江，其主力部队纷纷进入川滇边境，造成黔北兵力空虚。中央军委果断放弃了北渡长江的决定，红军突然东渡赤水。

### （二）二渡赤水建立黔北根据地构想

2月15日，朱德发出二渡赤水的行动计划，特别指出：“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的作战目标”。从2月18日起，红一方面军左右纵队、军委纵队及一军团分别在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等地渡过赤水。红军从滇东北扎西回师黔北，把蒋介石的重兵大部分甩在了赤水河以西的川滇黔边地区，使弱而分散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孤立出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战机。

2月24日，红一军团进占桐梓，总部要求乘虚占领娄山关。娄山关位于遵义、桐梓两县交界处，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2月25日至26日，红一方面军在娄山关歼灭黔军两个团。打开了遵义的北大门，使遵义无险可守。27日下午，红军在遵

义北面与黔军的两个团接触，将敌击溃。红一军团占领遵义新城。红三军团兵分两路向遵义城东、西两侧包抄，逼近老城。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侦察时被流弹击中，不幸牺牲。军委这时发出了攻占老城的命令，两路红军勇猛顽强，于28日凌晨攻入老城。

红军攻占老城不久，蒋介石嫡系吴奇伟的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于当日上午赶到了遵义附近，与红军展开激战。这时，迂回到后方的红一军团，突然向敌指挥部所在地的忠庄铺发起攻击。敌军阵脚大乱，慌忙退却。红军乘胜全力出击。吴奇伟带领残部企图逃过乌江，除少数人员跟随其过江外，其余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为红军俘获。遵义地区战役历时五天，击溃和歼灭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

3月13日，红军前敌司令部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以控制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为主要作战对象。”它明确反映了红军的战略方针是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在赤水河两岸展开反复的运动战，全力打击周浑元纵队，目的就是要建立黔北根据地。红军于3月15日发起鲁班场攻坚战。周浑元纵队15个团凭坚固工事顽抗，血战一整天红军损失重大但未能获胜。毛泽东、朱德命令中央红军主动撤出战斗，向仁怀县中枢镇、茅台镇转移。

红军开辟根据地的传统是要打两仗、三仗才能建立起根据地。因为鲁班场之战的失利，红军无法在黔北立脚。红军需要迅速脱离险境，同时也要根据敌情变化，寻求新的战略方向。3月16日军委发出了三渡赤水的行动部署：“我野战军决于今16日晚和17日12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

### （三）三渡、四渡赤水后成功北渡金沙江

1935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从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四川古蔺县。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态势。红军三渡赤水后，蒋介石一面连续出动飞机对红军狂轰滥炸，一面严令各部队不分昼夜地在赤水河沿岸建立以碉堡群为依托的

封锁线，企图重演第五次“围剿”中的“铁桶计划”。

3月20日，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布命令：“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的发展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迅速组织渡河。必须做到限时渡毕。”并且强调“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与此同时，野战军司令部发出了四渡赤水的命令：“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21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这两道命令措辞严厉语气紧张，其目的显然针对四渡赤水后的行动。红军行动的关键是，第四次渡赤水后让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又回黔北是为了三占遵义而放松警惕，因此要求“各军团应乘月夜运动，在白天飞机活动时间，则区分各分队成梯队，伸长距离，加意对空伪装，逐段前进，黄昏进入宿营地，并要加强政治工作，使指战员努力争取南下先机。”很明显，红军是在尽量隐藏自己的行动目标避免过早地惊动蒋介石，以便最大限度地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

3月28日，红军主力部队迈开大步急速南下。3月31日，红军主力南渡乌江，转眼间就兵临蒋介石行营所在的贵阳城下了。就在滇军昼夜兼程东调贵阳之际，红军却绕过贵阳，向西直插云南。云南军阀一面向蒋求救，一面将云南北部金沙江军队南下增援。这样，重兵布防的金沙江防线已空。

期待已久的渡江北上时机终于出现，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万分火急的指示，“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转入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此时红军主力向北日夜兼程直驱金沙江，并于1935年5月3日至5月9日，就靠7只小船摆过金沙江。遵义会议渡过长江的目标得以实现。

### 四渡赤水为北渡长江创造条件

中央红军北渡长江，无论从中国革命发展的大方向，还是从中国革命力量的整合来看，都是正确

的。毛泽东、党中央指挥四渡赤水为北渡长江创造条件，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视野开阔。四渡赤水，与毛泽东在其他时期指挥的作战是有所不同的。**在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指挥红军反“进剿”、“会剿”和反“围剿”作战，是以根据地为依托，并有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而四渡赤水，是在失去根据地无后方依托，又面对数倍甚至十多倍的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严峻形势下进行的，对时空的把握就更为重要。国民党判明红军北渡长江的企图后，采取的是以北堵南追为主的战略，即以川军为主从北面封锁长江沿线，以中央军为主从南面追迫红军。赤水河作为长江上游的一级支流，由南向北注入长江。初春的赤水河，河水不急，对于红军来说，渡河不算困难。红军四渡赤水作为一种东西向的来回运动，有效地避开了国民党南北两个方向的兵锋。川黔边境地处云贵高原北端、四川盆地南缘，大部分地区海拔在一千五百米以上。川黔地形复杂、破碎、起伏大，红军在这样的地形间作移动，给国民党调整部署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国民党的部署中，“驰援”和“赶赴”等字样比比皆是。正是在这种经常变换作战方向，转移作战地区，在国民党军几十万重兵之间，大范围的迂回往来，红军找到了突破国民党封锁的路径。

**（二）走打结合。**第五次反“围剿”，红军与强大的国民党军打阵地仗，导致了“反围剿”失败。红军在战略转移初期，消极避战，始终摆脱不掉敌人的围堵。四渡赤水走和打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1935年2月15日，中央《告全体红军指战员书》中明确指出：“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个指示，进一步深刻说明了走与打的关系。土城之仗受挫，红军渡过赤水河暂避川军的兵锋。一渡赤水后，国民党川军、滇军、中央军十余万兵力齐聚川南之际，

红军二渡赤水突然返回黔北，乘势发起遵义战役大获全胜。遵义战役的胜利，极大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遵义战役后，红军攻击鲁班场失利，毛泽东又挥师三渡赤水，红军三渡赤水后，蒋介石认为红军是“向古蔺西南方向窜逃”，再次部署在川南围剿红军。在国民党部署即将完成之际，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蒋介石认为，红军将第三次攻击遵义。当截获了蒋介石就要到达贵阳的重要情报后，中央命令各部红军“以遭遇敌人姿态”，迅速“通过遵仁之线，向南寻求新的机动。”红军秘密离开黔北南下过乌江，逼贵阳，这样不仅能抢先一步跳出包围圈，还能直接威胁蒋介石本人的安全，从而促使战局出现很大的变数。如果没有向扎西的“走”和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就不可能大量调动敌人和造成有利战机，取得遵义地区歼敌的胜利。如果没有以后的三渡、四渡赤水的“走”，就不能加深敌之错觉，使红军乘隙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的。正是在走打结合的曲折行动中，达到了北渡长江的目的。

**（三）出奇制胜。**国民党对红军行动方向的判断，是以红军显形的行动为依据，往往追剿部署完成之际，而红军的行动已经改变，可以说国民党对战场形势的判断具有直观、直线的特点。而红军是把实现目标的坚定性与实现目标路径的灵活性有机结合在一起，战场思维具有跳跃、多维、变化多端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红军一渡赤水十几天后，二渡赤水返回黔北；也才有了三渡赤水仅四天后又四渡赤水返回黔北，这些完全有悖一般军事行为的举动。特别是第四次渡过赤水后，红军完全抛弃了以往先设定目标，然后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发动攻坚战的模式，先是声西击东佯攻遵义，再是虚北实南突破乌江兵临贵阳，蒋介石为保自身安全，不得不就近调滇军“护驾”，不自觉地将云南的大门敞开，毛泽东“调出滇军就是胜利”是蒋介石帮忙实现的。红军接着威逼昆明，最后巧渡金沙江。四渡赤水这部出奇制胜大戏的结局是，突破十倍于

我之敌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

## 长征史诗中江河元素

长征二万五千里，与江河有着不解之缘，江河是长征中最重要的元素，仅以红一方面军为例，长征中，跨越了于都河、湘江、乌江、赤水、金沙江、大渡河等河流。红军长征跨江渡河，所蕴含的崇高的审美价值，它所带来的心灵震撼及其人生启迪，是一笔独特的精神财富，是红军长征史诗中熠熠生辉的元素。

**（一）长征史诗中江河元素的内涵。**红军万里跋涉，是和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国民党在围堵红军的战略计划中，通常利用江河的天险屏障，制定陷红军于死地的战略计划。而红军要打破国民党的追堵，就必须渡过已经被严密封锁的江河天险。敌我双方围绕江河，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大戏，传奇故事就是长征江河元素最基本的内涵。红军长征渡过的江河形态各异，或静谧安详，或波涛汹涌，或在平原中流淌，或在峡谷中奔腾。长征是一部伟大的史诗，红军长征的悲壮寓于江河，大自然的造化为长征增添了无与伦比的美感。江河的壮阔更衬托出红军的豪迈。总之艰难曲折的万里长征与万水千山的“水”，紧密相连，长征的江河元素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以长征江河元素为题材的文字、图片、影视、博物馆浩如烟海，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以诗词为例：

咏叹壮阔与苍凉。在毛泽东的著名诗篇《长征》特别提到了金沙江“金沙水拍云崖暖”，金沙江流经云贵高原西北部、川西南山地，由于流经山高谷深的横断山区，水流湍急，向东南奔腾直下。到四川盆地西南部的宜宾接纳岷江为止。毛泽东的《长征》诗中也提到了大渡河“大渡桥横铁索寒”。泸定桥位于中国四川省西部的大渡河上。清康熙帝统一中国后，为加强川藏地区的交流而御批修建此桥，并在桥头立御牌。桥长103米，宽3米，13根铁链固定在两岸桥台落井里，9根作底链，4根分

两侧作扶手，共有12164个铁环相扣，全桥铁件重40余吨。两岸桥头堡为木结构古建筑。此桥为四川入藏的重要通道和军事要津。1935年5月29日，红军长征途经这里，以22位勇士为先导的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在铁索桥上匍匐前进，一举消灭桥头守卫。高山峡谷中奔腾的大渡河水，粗大铁索拉就的百年古桥，由于有了红军的故事，由于有了毛泽东的诗词，愈显壮阔与苍凉。

感慨悲壮与豪迈。1934年10月，秋风萧瑟，秋水寒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中央政府所属机关和红一、三、五、八军团八万六千人历时九天，分别从于都县城的东门等十个渡口过河，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陆定一的这首诗，被永远镌刻在于都河畔，从中流露的浩然与悲壮，历久弥醇。红军强渡大渡河，聂荣臻“大渡河水险，我非石达开。一举强渡胜，三军大步前。”聂荣臻的诗，铿锵有力地表达了红军打破石达开大渡河畔全军覆没的宿命，表达了红军战胜天险，战胜强敌的豪迈气势。

赞颂惊险与传奇。赤水河为中国长江上游支流，流经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经贵州省赤水市至四川省合江县入长江，全长523千米。四分之三流域在大山中，河水清澈，两岸陡峭、多险滩急流。毛泽东称，四渡赤水是他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萧华的长征组歌：“乌江天险重飞渡，抵近贵阳逼昆明”，“调虎离山袭金沙，我军乘胜赶路程”形象生动地诠释了毛泽东导演的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这一传奇大戏，驰骋纵横生龙活虎，高瞻远瞩气势磅礴，令人浮想联翩。李一氓诗“十七人飞十七桨，一船烽火浪滔滔。输他大渡称天险，又见红军过铁桥。”将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惊险故事，浓缩于短诗中，寓意着革命的乐观主义。

**（二）红军长征史诗江河元素的当代价值。**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年来，长征历史的研究、宣传经久不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美好的理想而奋斗。“长征”一词，已经成为为了理想信念，不畏

艰险，奋斗不息的代名词。进一步深入挖掘红军长征江河元素的内涵，以更新的视角来认识长征史诗中的江河元素，仍然是十分有意义的。

赋予长征江河元素悲壮色彩。长征精神已经深入人心，长征的传奇故事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以往对长征江河元素诠释更多的是领袖的足智多谋，将士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而对长征江河元素中悲壮的内涵挖掘不够。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中央红军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湘江战役是长征起程后的悲剧篇章。悲剧性的审美意义是具有正面素质或英雄性格的人物，在具有必然性的社会矛盾剧烈冲突中，遭到不应有的、但又是有的死亡或痛苦。这个过程或结果使人们陷入剧烈的悲痛，但又被具有正面素质或英雄性格的巨大精神力量所感染，所震撼。悲剧不是重在对苦难的渲染，而是重在对反抗苦难和毁灭中所呈现出来的抗争之美的表现上，在于张扬人的生命本质。今天的湘江硝烟早已散尽，枪炮声伴随的战马嘶鸣也已远去。奔流不息的湘江水，见证了中国革命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今天进一步挖掘湘江之战的悲剧内涵，通过再现湘江苏之战的场面，必然能够激发出人们到湘江之战遗址去感受惊心动魄战争场景的强烈愿望，在对悲剧性战争场景的感悟中，提高精神境界，产生审美愉悦。

重视江河元素的视觉信息传播。视觉信息与文字信息的一个最为明显的区别是它的外部特征。比如色彩、图案、影视画面这些外在形式，它们一方面是传播信息的手段，另一方面也给受众带来美的享受。当代社会，更应重视红军长征江河元素的视觉信息传播，江河之壮阔，再赋予红军的魂魄，所产生的画面美感是震撼人心的。今天红色旅游方兴未艾，红军长征跨过的江河，应成为红色旅游的最佳点线。以红军两次强渡的乌江为例，乌江为贵州省第一大河，长江上游右岸支流。发源于贵州省境内威宁县，流经黔北及川东南，在重庆涪陵市注入长江，干流全长1037公里。乌江流域地势西南

高，东北低，由于地势高差大，切割强，自然景观垂直变化明显。以流急、滩多、谷狭而令人神往。红军两次渡过乌江，关联着党和红军的命运。第一次强渡乌江占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第二次渡过乌江，直逼蒋介石所在的贵阳行营，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堵。大自然的造化有了壮美的乌江，红军两过乌江赋予了乌江神奇的文化内涵。可以想见，以探寻红军足迹为目的的乌江游，人们在红军故事的强烈感染中，在美仑美奂的画面和江水的激荡中净化和陶冶了情操。

在体验式的江河游中解读红军的传奇故事。体验式旅游强调主体主动自觉地参与，让心灵去旅行。体验式旅游是旅游的高级形态。长征中的江河元素，有着血肉贯注、气韵生动的气质，其体现出来的人性精神是超越时代的。通过现场的体验更能达到使人们精神升华、身心愉悦的目的。大渡河位于四川省中西部，是中国长江支流岷江的最大支流，奔腾的大渡河，因红军而闻名于世。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传奇故事，激励了几代中国人。如果说四渡赤水的传奇故事，更多体现在高层的运筹帷幄与神来之笔。那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则体现的是基层官兵突破一般的军事理念、突破生理极限的英雄壮举，在汹涌澎湃的大渡河水畔，在晃动不止的铁索桥上，听着震耳欲聋的涛声，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去解读当年红军日行三百里，冒着炮火爬过铁索的故事。今天的年轻一代，会被当年同样年轻战士巨大的生命张力所震撼。当代青年对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现场的体验，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什么是理想超越生命的力量。会对人生道路上如何战胜艰难险阻，取得事业的成功有所感悟。

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当年红军战斗过的江河渡口都建设起了纪念碑、博物馆等纪念设施，成为红色旅游的精品线路。可以设想，在符合当代青年的审美情趣、体验需求、壮阔景色的渲染等方面再下功夫，长征江河元素在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在红色旅游中的价值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 “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

——浅谈20世纪70年代初期陈云的对外经济工作思想

文/董振瑞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内久负盛名的经济专家。1949年以后，他曾长期领导新中国的财经工作并为此作出了卓越贡献。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曾以“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古训表达了他对陈云的赞赏之情。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陈云即长期处在“靠边站”的处境中。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后，他才得以再度“出山”，协助周恩来考虑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

在此期间，陈云紧紧依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并围绕上述工作进入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真知灼见并且影响深远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较为集中地涉及到如何看待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美元与黄金关系等三个重要问题。本文试围绕这三个问题，浅析陈云在此期间的思想发展及其对日后中国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 一、“要很好地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

1972年春寒将尽的时候，“谪居”江西二年零七个月的陈云回到了北京。相较于他离京之时，此时中国的内外形势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内来讲，“九一三”事件之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积极纠正极“左”思潮，并着力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和整顿。以引进国外成套化纤、化肥技术先进设备等为契机，中国的外贸工作正孕育着新的突破，以往受冲击的重点、且被攻击为“崇洋媚外”、“为封、资、修服务”的对外经济工作出现了重要转机；从国际来讲，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

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一些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国家安全形势和对外关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这就为中国扩大同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尤其是加强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往来创造了条件，中国的对外经济工作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上述深刻变化，促发了陈云对中国的对外经济工作有了新的深入思考。围绕如何看待其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资本主义国家这个中心问题，陈云提出了“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等一系列重要观点。这些观点均集中体现在1973年、1974年间他的一系列谈话和发言提纲中。具体说来，他提出：

第一，要重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政府奉行“一边倒”的对外方针，因此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一直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受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影响，中国对苏东国家的贸易额开始急剧下降；而与此同时，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逐步成为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市场。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中国对苏东国家的出口比重从60%和17%下降至9.9%和7.9%，进口比重从60%和17%下降至9.2%和6.3%；而同期对西欧国家的年平均进出口额却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20%左右，最高年份甚至达30%，且对日本、东南亚地区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贸易也在持续上升中。<sup>①</sup>

陈云十分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对外贸易格局方面

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出来工作后不久，他就明确提出：“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sup>②</sup>，“正好倒了一个个儿”<sup>③</sup>，“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sup>④</sup>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在协助领导对外贸易的日常工作中，他反复强调要认清中国对外贸易格局发生的这一新变化，重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他说：“目前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额的75%，比重很大，要认真重视。”<sup>⑤</sup>陈云的这一观点，不仅帮助对外经济工作战线解放了思想，排除了顾虑，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对外贸易工作的着力方向。

第二，要加强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既然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已是大势所趋，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垂而不死”的资本主义呢？对于这个重大且敏感的问题，陈云一如既往地从调查研究入手。1973年5月到6月，陈云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认真听取了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粮油食品、纺织品、土特产品、轻工业、五金矿产、石油化工产品、机械、技术等八个进出口总公司及中国外贸运输总公司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深入了解和掌握了这方面的一些具体情况。在此基础上，他从多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

他认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不研究资本主义就要吃亏。就此，他在1973年7、8月间同外贸部负责人及该部价格小组成员座谈中，曾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的剧烈动荡，以及国内关于美元与黄金关系走向上的一些不准确研判，尖锐地指出：“现在关于货币危机的文章都没有说到点上”，“以为美元已经恢复稳定。这是估计错误。”“你们拿美元同国民党的金元券相比是错误的。”“不要只看一面倒的东西。”他还直言了这些不准确研判后面的症结所在，以帮助大家解放思想。他说：“在每盎司80美元时，我曾建议用外汇买进一些黄金保值，但银行认为利息损失大，不合算。买黄金是为了保值，不是投机。买进黄金以后，可不可以再卖出去？如果需要付款，还可以卖

出去。这不是倒卖，而是为了支付。”<sup>⑥</sup>

据此，他要求相关部门要加强对资本主义的了解和研究。他说：“我们做的生意是大买卖。”“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sup>⑦</sup>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不仅要求外贸部要加强人手，多用些懂外文的老手，要求人民银行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撤销的金融研究所恢复起来，以担负起全面研究资本主义的任务，还提出要对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材料，以及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sup>⑧</sup>等人的讲话材料进行系统研究。并明确要求：外贸部要管好商品价格的波动；人民银行要管好货币波动；新华社要加强与人民银行、外贸部的合作，以全面收集外电中有关商情的报道。

第三，要很好地利用资本主义。在强调要研究资本主义的同时，陈云还在党内较早地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1973年4月，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布置香港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尽快购买年内到货的原糖47万吨。五丰行委托香港商人出面，利用国际市场上的期货交易，不仅完成了购买现货任务，并从中赚得240万英镑。7月，当五丰行总经理向陈云汇报此事时，陈云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明确表示“我们可以利用交易所”。他说：“利用资本主义交易所是一个政策性的大问题”，“交易所是有两重性，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投机性的一面，忽视它是大宗交易场所的一面，因此，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sup>⑨</sup>

三个月后，在代外贸部起草报送国务院的《关于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问题的请示报告》中，他又郑重提出：对资本主义交易所具有两重性，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sup>⑩</sup>在陈云的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外贸部门在购买国内需要的粮食、棉花等物资时，灵活运用期货手段，积极参与国外交易市场活动，在完成购买任务的同时，为国家赚取了外汇。

## 二、“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生产力超过了市场购买力”

20世纪70年代初期,确立美元霸权地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走向了崩溃。该体系崩溃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汇率、利率、股市和物价动荡不定,国际收支经常失衡,贸易保护主义此起彼伏,金融领域充满混乱和动荡。雪上加霜的是,1973年在经历石油危机的同时,资本主义世界又爆发了一场二战后最为严重、历时近两年的经济危机。如何看待和分析这场声势浩大的经济危机,自然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工作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陈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十分深入的思考。具体说来:

第一,关于此次危机爆发的原因、特征及其影响。对这个问题,陈云联系1973年由第四次中东战争所引发的石油危机进行了全面分析。他认为,此次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是与国际关系相适应的,是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现”分不开的,石油危机尤其说明了第三世界的力量。但与此同时,他又指出:在危机和衰退中,资本主义世界的粮食、化肥、食糖及部分生产设备、钢管钢丝等仍保持旺盛势头,贸易量仍在持续扩大。尤其是中国、苏联、东欧各国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在继续购粮。这就说明,石油危机只是加重了此次危机,而并非其根源。这场危机仍然是一场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其根源仍然是生产力超过了市场购买力。<sup>⑩</sup>

对这场危机可能造成的后果,陈云也进行了抽丝剥茧的系统评估。他认为,从国际形势而言,“美与各大资本主义国家有矛盾”,相互寻求转嫁危机,“但美不能让哪一国垮”;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在禁运粮食方面步调不一,美国同西欧、日本石油政策不一,美国亦不愿苏联插手中东油田,世界大战各有顾忌;从危机的利害程度而言,“第三世界劳动人民受害最大”,“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受害很重”,“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是轻微受害者或不受害”,“最大的石油出口和石油出口收入多于其他进口货国家是得利者”,“资本主义大

国的大垄断资本家是最大的得利者”。据此,他进一步作出判断:经过这次危机,“美帝经济金融霸权已结束”,但由于美国仍然是“生产潜力产业、粮食主要出口国”,“回旋余地比较最大”,因此“美钞发行权仍是世界主要通货”,“美帝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仍居首位”。<sup>⑪</sup>

第二,关于此次危机与1929年经济危机的异同。伴随美元危机、中东战争及石油危机而来的这场波及广泛的经济危机来势汹汹,国际舆论甚至将其与1929年席卷全球的那场“大危机”相提并论。众所周知,大危机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使欧亚大陆产生了德、日两个法西斯的战争策源地。那么,历史会否重演?不少人都深表忧虑。对于这个问题,陈云异常慎重,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观察与分析。

早在1973年7月同外贸部价格小组座谈时,他便提出了这个各界均极为关注的问题,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经不住再来这样的大危机”<sup>⑫</sup>。为此,他建议与会同志看看斯大林在1930年苏共第十六大和1936年苏共十七大报告中关于1929年大危机的部分,以便深入研究大危机问题。

经过一年多的仔细观察和慎重分析,陈云最终对这个问题最终得出了比较明确的结论。这一结论,集中地体现在他根据人民银行提供的资料所写出的《这次经济危机与一九二九年危机的比较》和《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看法》等两份材料中。

在这两份材料中,他详细比较了这两场经济危机的异同。他认为,这次经济危机“紧迫感”大于1929年,但其广度与深度却不到1929年的程度。这表现在:1、工业部门的钢铁和化肥等生产未降或仅仅开始停滞下降;2、粮食供应仍然紧张;3、危机仅仅个别的波及到信贷部门;4、失业人数比1929-1932年少。据此,他判断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后果亦会有别于1929年的大危机。原因是:1、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了1929年大危机的教训;2、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力量很大;3、战后美国对欧洲1000亿美元的经济支持(马歇尔计划);4、美国有侵朝侵越战争的教训,因此一定会在打与不打之间

慎重权衡：如果能“冒维持的损失而能渡过危机”，“则暂时不打”；“如果会全失，则必打”。打与不打的界限，就在于美国是否能通过“部分失而维持到渡过危机”。<sup>④</sup>

陈云的这些判断，基本把握住了20世纪70年代初形成的新的国际关系体系中的矛盾变化，也帮助对外经济工作战线进一步研判清楚了世界经济的走向，并为中国对外贸易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第三，关于此次危机演变的前景。通过深入分析，陈云对此次危机的演变前景作出了三种预估：一是，“走钢丝”；二是，较大地放松通货；三是，较大幅度、较长时间地收缩通货，尽量少用资金，略减工时，降低库存，以等待形势好转。他认为，第一条路会“难到底”；第二条路，各国不敢，美国也不敢；因此，只有第三条路的“可能较大”。<sup>⑤</sup>

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陈云又颇具先见地提出了“要学会跌价下做生意”的重要意见。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印证了陈云的这一预判。为克服经济危机，西方国家起先依旧惯性地采取了战后所实行的凯恩斯主义，冀图通过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来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其结果是通货继续膨胀，失业率持续上升。于是，大多数国家又转而采取紧缩政策，收紧货币信贷政策。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急于寻求市场，中国政府抓住有利时机，根据国内需要，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引进的规模。

### 三、“美元虽已垮台，但在一个时期仍是国际主要货币”

二战后期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这一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的汇率。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由于美国滥印美元及别国利用贸易顺差不断向美国兑取黄金，造成美国黄金储备不断下降，美元持续贬值，并接连发生了数次美元危机。在此背景下，1971年美国最终宣布停

止美元和黄金之间的自由兑换，即美元与黄金脱钩。陈云十分敏锐地觉察到这是国际金融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将会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围绕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具体说来：

第一，“美元与黄金的关系已断，恢复是不可能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原因很多，但是二战后西欧、日本等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他们向美国大量销售商品，并在货币、金融等领域同其进行激烈的经济斗争，导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增大，美国黄金储备不断下降，更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对此，陈云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表面看是货币危机，实际上是经济危机，是生产力超过市场需要的反映。”<sup>⑥</sup>他认为，战后在美国的支持下，西欧国家逐步由“‘五保户’变为‘爆发户’”，“八百亿欧洲美元到处攻”，导致美元贬值，发生了美元危机，以致于以美元和黄金相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难以为继，走向了崩溃。<sup>⑦</sup>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这些深层次因素的分析，他明确表示美元与黄金已隔断关系，不存在恢复的可能。

第二，“美元虽软，但在较长时期内仍会是国际主要货币。”美元与黄金虽然脱钩了，但是美国依仗其雄厚实力，依旧将美元作为其获取全球霸权的重要手段。陈云对此认识得十分深刻。他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崩溃了，但美国生产力仍然要占到世界的30%，因此美元虽衰败但还没有其他货币可以替代。他不同意将美元与解放战争时国民党的金圆券相提并论，并认为美元不会跌得一塌糊涂。他说：“那时国民党已经没有生产基础，而美国还有雄厚的生产基础。现在美国已开始干预美元的下跌，因为跌得多，影响政府威信，要充分注意，不要只看到一面倒的东西。”<sup>⑧</sup>“美元虽软，但在较长时期内仍会是国际主要货币，没有别的货币能代替它，原因是美国生产力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大的。”<sup>⑨</sup>

第三，“黄金价格还是要上涨的。”在对同期的美元危机、石油危机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经过认真分析后，陈云得出了这样一条结论。他认为，美元在较长时期内仍是国际主要货币，但是美元同黄

金的关系已割断，不可能再恢复，而黄金将有很大的升值潜力。据此，他明确指出：“黄金的价格还是要上涨的。”“今后金价仍看涨”。<sup>①</sup>而且，他针对当时中国有一批外汇存在瑞士银行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要使这笔宝贵的外汇保值增值的想法。他说：“目前我国外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购买我们生产所需要的物资外，可买些黄金。”<sup>②</sup>“我们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遭受风险，不如用这些外汇买点黄金存起来”。<sup>③</sup>很快，他的这一建议为国务院采纳。中国政府抓住机会，在国际市场购买了大量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经过努力，1974年我国的黄金储备达到1280万盎司，比1970年的700万盎司增加了近一倍。历史的发展，同样印证了陈云这一预判的远见卓识。1979年和1980年，我国财政曾出现的较为严重的赤字，就是靠出售这笔黄金才得以填补的。进入新时期以后，陈云仍继续把增持黄金储备作为我国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强调。他反复指出：中国这么大，有几百吨黄金

储备不算多；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同西方国家打交道多起来了，增加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是正确的。实践证明，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元割断同黄金的关联的情况下，陈云建议购进黄金这个“硬通货”，不仅保证了国家的外汇安全是有益的，还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大规模扩大进口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历史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国内谈“资”色变的年代，陈云围绕关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国际金融和货币等问题提出的这一系列重要思想，充分体现出了陈云在对外经济往来中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既帮助人们破除“左”的思想束缚，准确指明了中国外贸工作的基本格局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还连同其时周恩来、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关对外经济工作的思想，一起汇成了党在70年代末关于中国对外开放方针的先声。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研究员）

## 参考文献

- ① 《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下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 ②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218页。
- ③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93页。
- ④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
- ⑤ 《陈云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9页。
- ⑥ 《陈云一九七三年关于对外经济工作的几次谈话》，《党的文献》，2015年第3期。
- ⑦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页。
- ⑧ 康纳利即约翰·康纳利，时任美国总统国内外事务顾问。舒尔茨即乔治·舒尔茨，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德斯坦即吉斯卡尔·德斯坦，时任法国财政部部长。
- ⑨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98页。
- ⑩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 ⑪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11页。
- ⑫ 《陈云关于七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两份提纲（一九七四年七月）》，《党的文献》，2000年第3期。
- ⑬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99页。
- ⑭ 《陈云关于七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两份提纲（一九七四年七月）》，《党的文献》，2000年第3期。
- ⑮ 《陈云关于七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两份提纲（一九七四年七月）》，《党的文献》，2000年第3期。
- ⑯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10页。
- ⑰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99页。
- ⑱ 《陈云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9页。
- ⑲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99页。
- ⑳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98页。
- ㉑ 《陈云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5页。
- ㉒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08页。

## 王维舟与延安大生产运动

文/王荣成



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的王维舟。

1937年8月起，王维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率旅直并一个团编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驻守陇东，执行保卫党中央陕甘宁边区的任务。1940年4月至1942年12月兼任陕甘宁边区陇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1941年1月至1945年8月兼任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警备司令员。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领导镇原、东华池、西华池、合水、曲子、环县、庆阳等地军民坚持抗战、支援前线；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 一、一把镢头一杆枪，自力更生保卫党中央

#### （一）挖窑洞修建住房

自古以来，士兵可是“公家人”，历来是吃公家粮的。王维舟初到陇东时，困难重重，衣食住行

等问题都亟待解决。1937年冬，部队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住房。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又不给人民群众添麻烦、增加负担，王维舟率领干部、战士在庆阳的麻家湾、田家城沿山崖城墙打窑洞100多孔，解决了旅直属机关部队住房困难。

#### （二）自己动手开荒地

陇东地区比较偏僻，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群众生活很苦，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掠夺和土匪的骚扰，民不聊生。部队每人每天发菜金5分，粮食一斤半。这点钱买了菜就买不了油盐柴禾，买了油盐柴禾就买不了菜，吃肉就甭提了。有的连队因蔬菜接济不上，就利用便宜的陕北盐，为省菜就多放盐。王维舟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向部队指战员提出：“一把镢头一杆枪，自力更生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全体指战员热烈响应王旅长的号召。在王维舟的带领下，开展了生产自给运动。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王维舟深知在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必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长期抗战面临的困难是财政和经济的困难。为了解决面临的困难，王维舟遵照留守兵团的指示开始行动起来，自行想办法：种菜、生豆芽、磨豆腐、喂猪、养羊、砍柴、烧炭、打草鞋、做鞋、以及捻毛线、打毛衣、毛袜手套等生活必需品，搞得热火朝天。6月，王维舟兼任三八五旅政治委员，年底升任三八五旅旅长。他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建设是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物质基础。1938年全旅种蔬菜140多亩，养猪200多头，平均每个伙食单位四至六头，最好的是旅司令部，大小养了18头，砍柴总共237000多斤。为了解决干部战士穿鞋难的问题，

发动指战员自己动手做鞋、打草鞋，总共做了4500多双（内有一部分棉鞋），平均每人一双。为了解决部队和人民群众吃盐的困难问题。把部队的骡、马、驴等牲口统一组织起来，到定边去驮盐。这不仅解决了部队自己吃盐，还把多余的盐交给合作社和贸易货站卖给群众吃。并在边区贸易公司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下把特产，如盐、甘草、皮货等物质有组织地出口，换回紧缺的物资，如棉花、布匹、医药等。与此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合作社，如开办了磨坊、油坊、豆腐坊、粉坊等作坊。自己磨面比交当地群众磨，每一百斤麦子要多磨十多斤，麦麸子、豆渣、粉渣、油饼还可以喂猪、喂牲口，这样又节省了马料。由于生产发展了，生活改善了，在节省的伙食金内，抽出一部分给战士卖羊毛、驼毛捻毛线，打毛衣、手套、袜子等，保证每人一双以上。提倡战士自己缝补衣服。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互相关心竞赛，整个部队的生产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毛泽东得知这些情况后，很高兴地说，对部队的这些做法，要给予鼓励，要注意帮他们总结经验。克服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我们部队必须学会搞生产，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把生产、学习与战斗结合起来。

### （三）发展生产，自力更生

1939年春季，国民党停发了三八五旅的一切经费，并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1939年1月初，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会上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和边区人民群众开展必要的生产。王维舟响应党中央“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动员全体干

部、战士种菜、养猪、养羊、砍柴烧炭、打草鞋、纺线，办油坊、磨坊、豆腐坊。王维舟向部队和陇东人民群众提出了“一把镢头一杆枪，自力更生保卫党中央”，领导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开荒种地时，王维舟指示部队不要影响当地老乡的种地面积，旅部直属单位在陡坡，深沟的地方开荒、平整土地。

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要求“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和决策，明确提出“自给自足”，大大激发了边区军民的积极性和热情。

## 二、响应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

留守兵团的生产自给运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让毛泽东感到分外欣慰。1940年12月的一天，毛泽东把林伯渠、萧劲光等人找去，专题研究进一步开展生产自给事宜。经过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靠我们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发刊词中指出：长期抗战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就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



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军民在纺纱。

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1941年2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陕甘宁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

1941年，为打破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的经济封锁，党中央决定在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陇东分区积极响应，坚持“以农为主，商业次之”的生产自救方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王维舟打仗是英雄，生产是模范。经过一年的努力，部队吃住问题基本解决，但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外地的棉花运不进来，战士们穿衣成了问题，而陇东又没有种棉花的历史。王维舟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访问有种过棉花经验的战士，从而摸清了棉花的习性、特点，种植规律，亲自开辟了一亩八分地作为试验田，适时播种，备好土坯，防冻防寒，因地制宜，确定株距、行距，定苗、移苗、栽培，保证苗壮苗全，土洋结合，防虫防病，掰芽打尖，抑制突长。第一年就得到了30多斤的皮棉，打破了陇东不能种植棉花的传统观念。翌年，王维舟种植的棉花在环县、曲子县、庆阳县等地得到了推广。1942年三八五旅种植棉花437亩，共收棉花8500多斤。经过生产自救，他们丰收的粮食和蔬菜不仅解决部队的吃饭、穿衣和取暖问题，还将多余部分支援兄弟部队。

庆阳、合水一带有水，王维舟领导的三八五旅就开荒种水稻，生产出陕北稀有的稻米。大凤川、小凤川一带，草深林密，他们把部队开进去，烧荒造地。树林里常有虎豹豺狼，他们就组织战士三人一组，把打猎同练习打靶结合起来，锻炼了射击本领，还猎获了不少野味。战士们打豹子的办法很有意思：把一颗手榴弹同一只野兔子拴在一起，挂在树枝上，豹子一口咬去，手榴弹爆炸，一只豹子便被猎获了。有一回，他们挑选了一只大豹子，运到延安，送给了朱德总司令。

## 三、自己动手，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标

### （一）边区军民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

兵民是胜利之本。边区军民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号召，积极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1941年，陇东分区党政机关和各县政府机关共开荒种地3000余亩，种地6000多亩，一年就达到衣食自给有余，减轻了人民负担。驻守陇东的八路军部队也加紧生产。1942年，王维舟亲自指挥七七〇团开进连续十二年荒芜的大凤川屯田开荒，创办农场。他一面勘察地形、草拟计划，规定任务，一面召开大会向干部战士做思想工作，带头行动起来，白手起家，在这百余里的地方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经过2年的艰苦奋斗，全团战士都住上了新营房，睡的热炕、烤的是木炭，吃的黄米饭、肉菜。不仅改变部队的的生活条件，还把多余的粮食送到延安、送到抗日前线。期间，全团共开垦了34000亩，收获万余石粮食，建起了400多间营房，修了5000多里便道，使昔日的大荒川变成了米粮川，这些丰硕的成果有力的支援的边区和抗日前线。

### （二）自己动手，达到了丰衣足食目标

1943年1月，在延安召开的高干会议上，中共中央西北局对领导大生产作出优异成绩的党政军领导干部王震、王维舟、习仲勋等22人进行表彰奖励。毛泽东分别为他们题词，为王维舟题写了“忠心耿耿，为党为国”。1944年，全分区种棉3万亩，收棉30万斤。同时，造纸、制革等手工业、运输业以及烟叶、大豆、蓝(可制作染料的作物)等经济作物，养蚕、养蜂等副业都有了新的发展，实现了自给自足和略有盈余的目标。以359旅为例，到1943年便做到了粮食和经费的全部自给，1944年，更是达到耕三余一，而且向边区政府缴纳公粮1万石。大生产运动使陇东抗日根据地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大生产运动中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经历了战争的人们，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

（作者单位：达州市宣汉县职业中专学校）

# 朱自清先生在叙永县作抗战演讲

文/颜 林



“叙永是个边城。永宁河曲折从城中流过，蜿蜒多姿态。河上有上下两桥。站在桥上看，似乎颇旷远；而山高水深，更有一种幽味。东城长街十多里，都用石板铺就，很宽阔，有气象，西城是马路，却石子像刀尖似的，一下雨，到处泥浆，两城都不好走。”

——摘自朱自清《致朱光潜信》

明月当空之夜，当我翻开案前《朱自清全集》第11卷第198页，阅读朱自清先生《致朱光潜信》中的这段文字，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朱自清先生寓居川南边城叙永的往事浮现在眼前，这是一件值得叙永人追忆的70多年前的往事。朱自清，这位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著名散文家、著名诗人，怎么会千里迢迢来到川南边城叙永呢？他给叙永人民留下了一些什么值得回忆的东西呢？

## 一路风尘一路歌

抗战时期，朱自清先生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当时，按西南联合大学规定的教师“轮休”制度，朱自清可以带薪离校休假一年。于是他决定1940年夏至1941年夏休假。1940年，刚放暑假，朱自清就偕同已怀孕的妻子陈竹隐（成都人）离开了西

南联大临时校址所在地昆明，于8月4日到达在成都。他们在成都市租得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内的旁院三间小瓦房，叶圣陶曾称为“望江楼对面朱先生的寓所”。休假一年期间，朱自清应杨振声之约，写完了近8万字的《古典常谈》，同时也完成了自己的教学研究计划。在成都期间，朱自清和叶圣陶经常互访，往来甚密，或赋诗唱和，或互诉衷肠，或小饮，或漫游。他还和肖公权相互唱酬，写了许多诗作。同时，他还与在成都军政界供职的家住蓉城董家山的叙永籍进步人士李铁夫结为好友，并赋《赠李铁夫》诗一首送给李铁夫。诗云：“董家山舍几优游，见说豪情胜辈流。载我倭迟下岷水，共君磊落数雄州。盘涡出入开心眼，抵掌从容散客愁。独去滇南无限路，主人长忆孟公俦。”（见《朱自清全集》第5卷第290页）

1941年夏末，假期即将结束，朱自清要回昆明西南联大上课了。为了节省开支，他考虑再三，决定将家眷留在成都，只身从水路经乐山、宜宾、纳溪，再由陆路经叙永，沿川滇公路回昆明。10月8日启程时，叶圣陶先生闻讯赶来相送。叶圣陶先生在临别时赠诗二首给朱自清，其中一首诗云：“平生俦侣寡，感子性情真。南北萍踪聚，东西锦水滨。追寻逾密约，相对拟芳醇。不谓秋风起，又来别恨新。”朱自清搭小船顺岷江而下。江水滔滔，往事历历，他坐在舟中，默诵着叶圣陶的诗句，乃提笔和韵赋诗两首。其中一首诗云：“论交略形迹，语默见君真。同作天涯客，长怀东海滨。贪吟诗句拙，酣饮酒筒醇。一载成都路，相偕意能新。”夜里，明月满江，烟水浩荡，朱自清又蓦地想起留在成都的一家数口，心中无限牵挂家人。

船到乐山停留一天，朱自清探望了在武汉大学的老朋友朱光潜、叶石荪、杨人梗等人。朱光潜陪

同他游览乌尤寺，看乐山大佛、蚕洞和龙泓寺。16日，朱自清乘船过干柏树。17日，船到宜宾，驶入长江。18日，船在烟云之间过干碓窝险滩，船夫号子激越凄厉，朱自清听了觉得有点胆颤心惊。还好，10多分钟就过了险滩，晚上到达纳溪。19日，朱自清从纳溪“赶黄鱼”前往叙永。由于汽车少，车票难以买到，只好出高价和司机商量搭乘。司机私下让搭乘的乘客叫做“黄鱼”，搭那种车的就称“赶黄鱼”。不料天下大雨，傍晚时车还没到叙永站，却因油尽而停住。他只得摸黑走路进城，走了十多里泥泞的石子路才到达叙永县城。

## 抗战演讲励学生

当时，西南联大在叙永县城设有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朱自清就住进了成都好友李铁夫的叙永家中（位于县城鱼市口，名曰“宝和堂”）。主人家待他很好，热情周到，他并不觉得是在作客。第一天晚上，因为在船上蜷曲久了，伸直了睡，朱自清觉得很舒服。由于晚餐十分丰盛，吃得过饱，一夜尽在梦境中度过。第二天起床，朱自清写成《好梦·再叠何字韵》诗。诗云：“山阴道上一宵过，菜圃羊蹄乱睡魔。弱岁情怀偕日丽，承平风物滞人多。鱼龙曼衍欢无极，觉梦悬殊带有科。但恨此宵难再得，劳生敢计醒如何？”朱自清在此诗的小序中说：“九月日夕，自成都抵叙永，甫得就榻酣眠，迺日饱饫肥甘，积食致梦，达旦不绝，梦境不能悉忆，只觉游目骋怀耳。”

叙永是个边城，永宁河曲折地从东西两城中缓缓流过，蜿蜒多姿。河上有上下两桥，上桥名蓬莱桥，下桥名永和桥，均为明代古桥。朱自清散步时伫立桥上眺望，感到颇旷远，山高水深，有一种幽味。东城长街十多里，都用石板铺就，很宽阔，有气象；西城是马路，石子像刀尖似的，一下雨到处是泥浆，很不好走。10月26日，朱自清给朱光潜写了一封信，把《好梦·再叠何字韵》诗随同信件一并寄给朱光潜。

朱自清先生在《致朱光潜信》这封信中，首先

对于朱光潜先生陪同作者游览乐山大佛等景观表示感谢，然后叙述自己去叙永路上的艰难历程。朱自清还在信中讨论了朱光潜先生批评《新理学》的文章。最后形象而具体地描绘了叙永这个边城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色，以及所受到叙永友人的热情款待。朱自清在信中写道：“我的主人很好客，住的地方也不错。第一晚到这儿，因为船上蜷曲久了，伸直了睡，舒服得很。那天吃得过饱，一夜尽作梦。梦境记不清楚，但可以当得‘娱目畅怀’一语。第二天写成一诗，抄奉一粲……弟自清顿首二十六日。”（见《朱自清全集》第11卷第198页）从信中可以看出来，患难之际朋友的相会和通信，是十分珍贵和值得怀念的。

当时，西南联大叙永分校的校本部在叙永城内文庙，女生宿舍在帝主宫，男生宿舍兼教室在南华宫和春秋祠，其他教室、实验室、图书阅览室、食堂等都分布在天上宫、城隍庙等各大庙宇中。课程设有国文、英文、中国通史、普通化学、微积分等。分校主任是“五四”时期就蜚声文坛的杨振声教授，著名教授吴晗、李广田等也在此执教。在叙永，朱自清和任教西南联大叙永分校的多年不见的好友李广田多次晤谈。朱自清和李广田谈得很愉快，主要是讨论抗战文艺，特别是抗战的诗，这次谈话更使他下决心从事评论抗战诗歌的工作。同时，朱自清还抽时间为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中文系的学生讲课。后来，李广田写道：“相隔十年，朱先生完全变了，穿短服，显得有些消瘦，大约已患胃病，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灰白头发和长眉毛，我很少见过别人有这么长眉毛的，当时还以为这是一种长寿的征象。”

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先修班学生葛学清（叙永人）回忆说，1941年10月，朱自清先生在叙永与我们那段短暂的接触，使我永远难以忘怀。当时，朱自清先生从由蓉城出发路过叙永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朱自清与李铁夫在成都时就是好朋友，因此，一到叙永他就住在县城鱼市口宝和堂商号李铁夫家三层的楼房里。朱自清来时带有李铁夫的一封信，介绍他与叙永盐商袁昭明相识。袁昭明是李铁

夫的好友，虽自幼从商，对文人学者却十分敬重，多次在家宴请朱自清先生，两人或漫谈，或一同观赏袁家珍藏的古玩字画，辨别真伪，相处甚欢。我刚刚从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先修班辍学，任教丹山补习学校，校址恰好就在袁昭明的住宅，所以有机会随时陪同朱自清先生。记得一个满天星星之夜，我与在宝和堂商号当学徒的袁耀祖陪着朱自清先生步出李铁夫家，漫步永宁河边，从杨武坊经永宁河的下桥转到上桥，观看两桥之间的夜景，古城叙永给朱自清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给了朱自清先生一种独特的感受。于是，后来朱自清先生在《致朱光潜信》中才有了那段关于古城叙永的真实记叙。朱自清把当时古城叙永的景况，描绘得多么真切啊！

朱自清早就是我国著名学者了，但他在叙永的那段日子里，仍是按时作息，孜孜不倦地治学。随身带的行李中，这箱是书，那箱也是书。午夜，人们都已呼呼入睡，而他仍俯首案前，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不停地翻书查资料，笔耕不停。朱自清非常热爱和关心青年一代，曾先后应叙永县立初级中学、私立培根小学的邀请，给学生作学术演讲和抗日演讲。他在叙永县立初级中学的抗战演讲，至今都是叙永人激励后生的最好教材。朱自清先生在慷慨激昂、抑扬顿挫的演讲中说：“日本人侵略我国，占去很多地方。国家已到危急存亡关头。青少年应有爱国家、爱民族、爱自由的伟大志气。不要辜负大好时光，刻苦学习，将来担负起挽救国家民族的伟大使命，打败敌人，收复失地，誓雪国耻。”他还鼓励“学生要努力学好各门功课，就如同拿起枪炮上前线杀日本鬼子一样”。朱自清的抗战演讲激发了有志青年，许多学生受其进步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初中毕业就奔赴抗日前线保家卫国。

### 好友相聚“不忆家”

袁耀祖回忆说：“1941年，正处抗日战争中，西南联大设立叙永分校，借叙永春秋祠后院以做教室。朱自清先生来永小住，其时本人只有几岁，因在李铁夫先生家与其共居一楼，有所接触。知先生

学识渊博，常请教先生问题，先生和蔼可亲，耐心回答，从不以白眼相待。迄今已60多年，忆及往事，尚铭刻于心。”李铁夫的侄子李其津也回忆说，“朱自清先生是我三伯父李铁夫志趣相投的朋友。1941年10月，先生赴昆明西南联大，途经叙永，曾住我三伯父家多日，相聚甚欢，临别赠诗二首，伯父珍惜，藏之多年。其时本人虽属几岁小儿，对先生的风采仪态也留下深刻记忆。”

由于有与李广田等老友欢聚的喜悦，又受到了李铁夫老友家人和朋友们的热情款待，朱自清先生在叙永停留了10天左右。11月上旬他坐车沿川滇公路回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1月13日，朱自清从黄土坡黎园村住处迁到司家营清华文学研究所居住，继续从事他的教学研究工作。

朱自清离开叙永前往昆明途中，写了一首《发叙永，车中寄铁夫》诗寄赠热情好客的好友李铁夫。诗云：“堂庑恢廓盘餐美，十日栖迟不忆家。忽报飙轮迎户外，遂教襆被去天涯。整装众手争俄顷，握别常言乘一哗。如此匆匆奈何许，登车回首屡长嗟。”（见《朱自清全集》第5卷第291页）诗中表达了朱自清先生对李铁夫家居居住环境和饮食的赞美，并且因为友谊深浓产生了“不忆家”的感觉。当时虽然是战乱时期，但叙永的友人们给了朱自清家的温暖。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朱自清先生离开边城叙永已经70多年了。弹指一挥间，旧貌换新颜。今天，边城叙永已被列为四川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旧址春秋祠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古桥上桥（蓬莱桥）、下桥（永和桥）也已被列为泸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县城道路宽阔平坦，不再是当年“石子像刀尖似的”了；新建于上下桥之间宽阔气派的扬武坊大桥宛若一道彩虹凌空飞架于永宁河之上，沿河两岸高楼林立，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我想，如果朱自清先生得知，亦当含笑于九泉之下吧。我又想，倘若朱自清先生现在漫步古城叙永，伫立扬武坊大桥观赏夜色，先生笔下的叙永景色一定会更加多姿多彩。

（作者单位：泸州市叙永县政协）

## 20世纪末四川扶贫攻坚（1978—2000）（上）

文/曾凡荣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历届四川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把发展贫困山区经济、解决群众温饱问题放在重要位置，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开发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就，创造了黔江精神和巴中经验等典型经验，为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作出了特殊的贡献。研究这一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对于推动四川和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



### 一、造成贫困的多种原因

四川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在历史上多数时期都是比较富足的。然而近现代以来，四川盆周山区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低下，大量农村人口陷入深程度的贫困之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一）自然原因：灾害频发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四川山多高原多，土地形态差异很大，平原占全省（含现重庆市，下同）总面积的2.5%，丘陵占18.2%，山地占49.8%，高原占29%。甘孜、阿坝和凉山州属高寒地区、牧区，海拔5000米以上是冰川雪原，属生命禁区；海拔5000米以下到海拔1500米地带是高山峡谷，人们只能在挂坡地上耕种，收入极低，还破坏生态；盆周山区大部分属喀斯特地貌，石山裸露，土地瘠薄，广种薄收；盆地丘陵地区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不足1亩，发展空间受限。自然灾害频繁是造成贫穷的直接原因，干旱、洪涝、虫灾、暴风、冰雹和地震、滑坡、泥石流，常常轮番袭击，一年遭灾，数年贫穷，有的地方灾害连年不断。

#### （二）历史原因：超常付出影响了人民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半河山沦陷，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退居大西南一隅。战争时期，粮食就是财富。四川人民克服种种困难，以各种形式贡献粮食支持长期抗战，以最保守的统计数据，抗战时期四川省出粮总数也在8千万市石以上，占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三分之一。抗战军费开支巨大，国民政府财政年年吃紧，四川省级财政负担着支撑地方政府开支、协同中央开发四川经济、支援抗战等重担，而国民政府还不断以法令布告强制向四川国民借款。抗战期间，四川国债储蓄折合成1937年价值为3亿多元。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内战的巨额开支，挽救濒于崩溃的财政经济，大量滥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给四川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痛苦和极其深重的经济灾难。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人民同样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做出了超常贡献。特别是大跃进之后的困难时期，四川人民节衣缩食，支援京津沪，支援大城市。1958年9月，四川省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实现了全省人民公社化。1959年至1961年3年间四川农业总产值逐年递减，人均粮食产量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3年中，四川仍向中央上交粮食587万吨。为保证迅速膨胀的城市供应和工业用粮，完

成粮食外调任务，四川连年征购粮食占产量的比重之高和农村人均留粮水平之低，均居全国前列，城市人口的口粮定量标准也一再降低，直到粮源枯竭，无力再外调。1962年，中央首次调给四川15.4万吨粮食。

### （三）区位优势原因：西南偏隅的劣势导致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四川地处西南一隅，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发展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基础设施脆弱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1985年统计数据显示，四川省贫困地区46个贫困县中有619个乡不通公路，3个民族自治州通公路的乡更是极少。同时，山区70%的乡村不通电，不通电话、广播、电视，交通闭塞、信息不灵，成了封闭之地；大中型水利设施年久失修，80%的坡地无灌溉保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落后、生产条件差的根本原因是山区经济不发达，财政入不敷出、集体经济薄弱、群众缺乏积累，无力投资建设，也有国家财力不足、投入极少的因素。

### （四）民族与人口原因：少数民族聚居地域广大与人口大省的实际难以脱贫

科技文化落后与贫困总是交织在一起。贫困地区地处偏僻，发展教育困难，山区不少村没有小学，许多乡没有中学，适龄儿童不能入学，青壮年不能脱盲，文化素质不高，是造成贫穷的重要原因，这个问题在藏族、羌族、彝族、土家族、苗族聚居的贫困地区尤为突出。人口超载，生态失调。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是造成贫穷的又一重要原因。

## 二、贫困区域分布情况及贫困状况

1978年底，全国农村8亿农民实际上都在温饱线上徘徊，其中2.5亿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四川的贫困状况尤其严重，按照国家确定的贫困标准测算，当年四川农村有贫困人口265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9.90%，占同期全国农村贫困人口10.70%。

### （一）贫困地区的分布

四川贫困地区主要分布在秦巴山区贫困地区、武陵山区贫困地区、乌蒙山区贫困地区、大小凉山贫困地区、西北高原贫困地区。根据扶贫标准的不同可划分为国定贫困县、省定贫困县和特困乡。

国定贫困县。1986年9月20日，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根据扶持标准，对全国各省（区）上报中央贴息贷款扶持县建议名单进行了审核，决定国家重点扶持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县271个，其中四川省列入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有16个，即：酉阳、石柱、黔江、彭水、秀山、仪陇、阆中、南部、广安、旺苍、苍溪、南江、通江、宣汉、渠县、城口。1988年2月22日，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第六次全体会议，决定全国共扶持27个牧区和半牧区县。其中，四川省有白玉、布拖、金阳、昭觉、美姑5个牧区和半牧区县。至此，四川由国家扶持的贫困县即国定贫困县共21个。到1994年，四川纳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由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43个，增加了即：武隆、巫溪、云阳、壤塘、喜德、普格、盐源、木里、得荣、兴文、古蔺、叙永、雷波、忠县、广元市朝天区、万县市五桥区、万县市天城区、黑水、越西、乡城、巴塘、南充市嘉陵区。1997年，四川和重庆分治，原属国家扶持的贫困县中有12个县改隶重庆市，四川的国家扶持县减为31个。

省定贫困县。1987年3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贫困山区经济开发的决定》规定，重点帮助农村人均年纯收入不足150元的县、老革命根据地和少数民族县。1988年4月，省委、省政府规定：把扶持线划定在人均年纯收入200元、粮食占有量300公斤以下。1990年7月，省政府规定，西部民族地区从1990年起，扶持农区90%以上的农户人均年纯收入达到200元，人均占有粮食达到300公斤；半农半牧区人均年纯收入达到250元，人均占有粮食达到250公斤；牧区人均年纯收入达到300元以上（均按1987年主要农牧产品价格计算）。1994年9月，省委、省政府实施《四川省七

一一八扶贫攻坚计划》，规定各贫困县要对贫困户现状作一次实地调查，扣除社会救济对象，将1993年底人均纯收入300元以下的农户重新建卡，要求乡造册、县建簿，作为扶贫攻坚的重点，通过扶持达到人均年纯收入500元（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人均年占有粮食400公斤的温饱标准。到1994年，四川省定贫困县40个，即巴中市（现巴州区）、平昌、万源、营山、西充、青川、剑阁、北川、平武、小金、茂县、南坪、金川、松潘、冕宁、九龙、稻城、德格、石渠、甘孜、盐边、汉源、宜宾、长宁、高县、筠连、珙县、屏山、沐川、马边、涪陵市、丰都、南川市、开县、奉节、巫山、潼南、广元市市中区、广元市元坝区、万县市龙宝区。1997年，四川与重庆分治，省定贫困县中有8个贫困县划归重庆市，省定贫困县减为32个。

特困乡。1996年10月，省委、省政府决定对生产条件差、脱贫难度大的991个特困乡9497个特困村、105.11万户特困户加大扶持力度，保证50%的扶贫资金用到特困乡特困村、特困户头上。1997年四川和重庆分治，四川特困乡减为707个，特困村减为6852个，特困户减为68.30万户。

## （二）贫困状况及表现特征

1984年7月，四川省委组织了10个厅（局）的工作组深入川东山区进行了为期1个月左右的调查研究。8月，省委书记杨汝岱向省委提出《关于涪、达、万山区调查和开发山区经济座谈会情况的报告》，列举了川东地区的贫困状况：川东涪陵、达县、万县地区21个山区县（占总县数的63.60%）的多数地区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但是，其产值、收入、发展速度都大大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贫困生产队和农户绝大部分在山区。川北、川南山区的经济发展和贫困状况与川东山区类似。1987年2月国家计委调查组在川用近1个月时间对盆周地区的6个地市、3个自治州的34个比较贫困的县进行了调查，认为按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人均年纯收入200元以下）计算，四川省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1/10左右（不包括3个自治州），其贫

困的主要表现是：一是食不果腹；二是衣不蔽体；三是住房不避风雨；四是人畜饮水困难；五是贫病交加；六是负债累累。

## 三、扶贫开发阶段性目标的确定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四川省扶贫工作重点采取了农村贫困救济的方式，如口粮救济、寒衣救济、住房救济等。1979—1985年，开展了农村改革；1986—1993年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1994—2000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实施“扶贫攻坚计划”。从1984年起到2000年，省委、省政府每年召开1次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检查部署扶贫工作，并从1998年起，把解决当年贫困人口温饱列入省委、省政府为全省人民办的10件好事、实事之一。

### （一）上世纪80年代：主要目标解决贫困山区农民温饱问题

从1980年起，省委、省政府就把发展贫困山区经济、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放在重要地位。1981—1983年先后3次召开贫困山区工作会议，对山区经济发展不断进行政策调整，放宽搞活，使山区群众的贫穷状况不断缓解。1986年6月，国务院提出了“争取在‘七五’期间解决大多数贫困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使贫困地区初步形成依靠自身力量发展商品经济的能力，逐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扶贫战略目标。1987年3月，省委、省政府结合四川贫困面大、基础薄弱、扶贫开发任务艰巨的特点，印发了《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贫困山区经济开发的决定》，提出通过积极有效的工作，进一步增强贫困山区发展经济的活力，更好地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支持贫困山区的经济开发，争取在“七五”时期基本解决全省贫困山区农民的温饱问题、少数地方在经济上有所启动的扶贫目标。该《决定》的重点是帮助人均年纯收入不足150元的县、老革命根据地县和少数民族县，分期分批摆脱贫困。1988年，省委、

省政府又下发了《关于加速贫困地区开发步伐的通知》，明确了解决温饱问题的标准和基础条件，对实行干部目标管理责任制、改革扶贫资金的管理使用办法、积极搞好开发性商品农业和加强智力开发、搞好科技扶贫提出了具体要求。

为保证“七五”时期扶贫目标和任务的实现，省委、省政府加强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扶贫开发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从1984年起，省委、省政府不断制定特殊政策，扶持贫困地区，如：免交农业税，调减粮食定购，对贫困地区新办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并由财政贴息安排专项扶贫贷款，省财政每年拨款200万元用于贫困地区扶贫培训，省交通厅每年补助山区公路建设资金2000万元，省卫生、教育部门每年拨款支持贫困地区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发展职业教育，省属大专院校对贫困地区定向降分招生；同时，对贫困县实行提前3年预拨财政定额补贴；帮助贫困县兴办富县项目；实行农副产品收购定基数，超基数返利以及自由销售等。上述政策的落实，使贫困县每年得实惠1亿元以上。

全省改救济式扶贫为经济开发扶贫，国家和省投入贫困地区的各项扶贫资金一律按项目投放，重点发展种养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到1990年止，全省共兴办种、养、加等项目3347个，扶持贫困户200余万户。大力兴办扶贫经济实体，积极推行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横向经济联合。全省“七五”时期共兴办扶贫经济实体1100多个，与沿海发达地区和省内成都、重庆市联合办富县企业107家，安排了5万个贫困户劳力就业，使90万贫困户增加了收入。动员省级机关51个单位和成都、重庆、自贡市到贫困县定点扶贫，派出干部1586名，拆借资金5700多万元，支持各种物资5048吨，同时还捐赠大量衣物和现金。与此同时，各市（地、州）贫困县的2086个机关单位也派出6426名干部到贫困乡村定点扶贫。全省加强智力开发，实施科技扶贫，通过大中专院校到贫困地区定向降分招生、优先分配等，为贫困地区培养大中专人才8600多名。同时，引进科技人才760多名，向贫困

县派出科技副县长51人，动员科技人员200多人到贫困地区承包扶贫项目，举办各种经济技术培训540多万人次，为贫困地区科技致富奠定了有力基础。在全省推广南川、旺苍两县计划生育与扶贫相结合经验，使贫困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0‰以下。

到1990年底止，全省盆周山区48个贫困县中有43个县按期解决了温饱问题。按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温饱标准，“七五”时期全省解决温饱建卡贫困户219.40万户、贫困人口1032万人，分别占建卡贫困户230.94万户的95%、建卡贫困人口111.39万人的93%，实现了“七五”时期解决农村绝大多数群众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

## （二）“八五”时期：发展支柱产业，带动农民增收

“七五”时期虽解决了四川贫困地区大多数群众的温饱，但仅是一个良好开端，与全国比较尚存在四个问题：一是四川解决温饱标准低；二是全省“七五”时期尚有150万人口未解决温饱；三是解决了温饱的贫困户不稳定；四是贫困程度深。

1990年7月，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八五”时期的扶贫目标和任务，即：启动内部活力，进行开发性生产建设，以种养业为基础，大搞开发农业，发展立足一地、兴办一业、带动一片的支柱产业，由单纯生产原料向加工业延伸，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把富县同富民更好地结合起来，为初步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打下基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17个贫困县，把解决大多数农牧民的温饱问题作为工作中心，1990年起，力争在三五年内完成这一任务。

1991年3月国务院提出“八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目标后，省委省政府于同年11月制定下发《关于“八五”期间搞好贫困地区区域性支柱产业的通知》，重新修订完善了“八五”时期四川扶贫开发的总目标，即：使多数农户有一个稳定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具体任务是必须在保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和人均粮食占有量逐渐增加的同时，建立起能够开发和利用当地资源、带动群众脱贫致富、形成县财政重要收入来源

的支柱产业，促进千家万户发展商品生产，稳定增加农民收入。

“八五”期间，四川省委、省政府继续加大扶贫开发工作力度，把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向少数民族地区和最贫困的乡、村转移，向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和最贫困、最落后、最偏僻的地区延伸。在各贫困县健全扶贫开发目标责任制，县、区、乡、村干部和党员，每人包扶1~3户贫困户，限期达标。继续对贫困地区实行特殊扶持政策，“七五”时期规定的扶贫政策继续执行。“八五”时期，省财政采取提前预拨定额补助，帮助贫困县兴办富县企业或对县属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培育财源，实现财政自给。西部民族地区农业税减免1/3，牧业税减免1/2。各级计划部门确保贫困县计划物资正常分配，并尽可能给予照顾。对西部民族地区12个省定贫困县，每年安排省财政贴息扶贫贷款1000万元、扶贫钢材计划1000吨、柴油1000吨、化肥600吨、汽车12辆。优先安排贫困地区资源开发项目，使之尽快形成支柱产业，做到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未解决群众温饱的贫困县把90%的扶贫资金投入贫困户解决温饱的种养业，已解决群众温饱的贫困县60%以上的扶贫资金用于稳定解决温饱项目。继续加强智力开发，培养当地人才，注重在校大学生职业技术教育和回乡青年实用技术培训。改善生产条件抓好农田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强贫困地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少返贫。实行异地扶贫，办好省级扶贫开发区，推进与发达地区的合作。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建设好贫困村党支部，选好脱贫致富带头人。广泛开展社会扶贫继续动员全社会力量以各种形式支持贫困地区经济开发。

据1993年的统计，盆周山区48个贫困县1113.39万建卡贫困人口人均年纯收入达到426元（1987年不变价计算），粮食占有量达到386公斤；西部民族地区21个贫困县建卡贫困人口92.36万人中有82.90万人、占90%的贫困人口达到或超过人均年纯收入200元、粮食300公斤温饱标准；贫困地区工农业产值达441.30亿元，每年平均递增

8.60%；新建公路1411公里，改造中低产田土82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40平方公里，完成人畜饮水工程5099处，解决了256.20万人和345.80万头牲畜饮水问题；新增电站770处，扩大保灌面积近100万亩；79.80%的村通了电；16个县新装程控电话，大多数乡通了电话；乡村卫生机构逐步健全；16个贫困县在成都市省扶贫开发区兴办了21家企业；贫困地区输出劳务300多万人，年汇回现金30多亿元。贫困农户收入增加后，有12.80万户迁出了岩洞和窝棚，有1/3的户盖了新房。

### （三）八七扶贫攻坚：基本解决全省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

1991—1993年，四川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明显减缓，扶贫开发工作处于徘徊不前状态，主要原因是：一方面，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向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延伸，本身难度随之加大。已经解决温饱的人口由于标准过低，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未得到根本改变，一遇自然灾害便重返贫困；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原有行政性扶贫优惠政策逐步弱化乃至失去效力，贫困地区更加处于劣势地位。国家扶贫投入虽有增加，但增长幅度不大，加上贫困地区在区域开发过程中又将有限的扶贫投入多用于办工业项目，贫困人口难以得到有效扶持。

为进一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国务院决定：从1994年到2000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并为此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省委、省政府根据要求，认真分析研究，制定了《四川省七一一八扶贫攻坚计划》，决定从1994年至2000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全省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七年时间，基本解决目前全省农村118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列入《四川省七一一八扶贫攻坚计划》的贫困县共83个，其中列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贫困县43个，涉及18个市（地、州）的

3298 个乡镇)、32876 个村、242432 个居民小组，分布在四川盆周的武陵山区、大巴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攀西大小凉山和川西北高原，共计面积 30.9 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242 万公顷，总人口 3784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3368 万人。1994 年各贫困县对 1993 年底人均年纯收入 300 元以下的贫困户、贫困人口(不含五保户和社会救济户)进行了重新登记，户建卡、村建档、乡造册、县建簿。列入《四川省七—八扶贫攻坚计划》的贫困户共计 270.10 万户、1180 万人。1997 年四川与重庆分治，原涪陵、万县、黔江地区以及重庆市的潼南县等 20 个贫困县划归重庆市。四川贫困县减为 63 个，其中国家定贫困县 31 个、省定贫困县 32 个，贫困人口 877 万人，建卡贫困户 173.61 万户、713.61 万人。

省委、省政府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把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自身努力与国家的扶持结合起来，改善生产条件，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集中力量首先解决贫困农民吃饭问题。因地制宜，选准脱贫路子，把有助于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种植业、养殖业和林果业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有计划地组织劳务输出。对缺乏基本生存条件的少数特困户，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实行开发式移民。扶贫工作做到“五到村、五到户”，即：工作深入到村，部门帮扶到村，计划分解到村，资金安排到村，责任落实到村；扶持对象到户，帮扶措施到户，扶持项目到户扶贫资金到户，领导联系到户。除用好中央分配到四川的扶贫资金外，省委、省政府决定：从 1994 年起原用于省定贫困县的贴息贷款从 2600 万元增加到 6000 万元，贷款使用期限由 1 年延长到 5 年。从 1997 年起在原有省财政投入的扶贫资金规模不变的基础上，每年增加 3000 万元：市(地、州)、县两级扶贫投入达到中央投入的 10% 以上。同时规定，扶贫资金的 50% 用到特困乡、特困村；85% 的资金用到贫困村，到村的 85% 的资金用于贫困户发业、养殖业和林果业。抓好科教扶贫，集中力量普及初等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依靠各级培训中心，培养贫困地区适用人才；组织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深入

贫困村、社传授科技实用技术，承包扶贫项目，创办科技扶贫实体，带动贫困户脱贫。坚持计划生育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推行扶贫与计划生育“双包制”，建立“先创造抚育条件再生育”的有效机制，控制贫困地区人口过快增长。继续动员全社会扶贫济困组织各级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工商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以及大中城市、发达地区定点扶贫，坚持不脱贫不脱钩。加强扶贫资金项目管理，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根据市(地、州)的贫困县数、贫困人口及贫困程度，决定扶贫资金分配方案，统一安排、相互匹配、综合投入。把 63 个贫困县确定的 9497 个村、89.73 万户贫困户、460.30 万贫困人口作为各类扶贫资金项目覆盖对象，不得分散使用，更不准挤占、挪用。扶贫项目由各级扶贫办组织有关部门共同规划、设计、筛选，资金管理部门评估、论证，各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统一立项上报，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批准实施，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在此之外擅自审批项目。加强扶贫工作领导，层层实行目标责任制，把全省 63 个贫困县划分为川北秦巴山片区、川南乌蒙山片区、攀西大小凉山片区、川西北高原片区，省委、省政府领导分片联系。副省级以上领导联系到贫困县，市(地、州)领导联系到贫困乡，县(市、区)领导联系到贫困村。各市(地、州)、县党政主要领导为扶贫开发的第一责任人，抓解决温饱问题。同时从省、市(地、州)、县、乡选派 2 万名干部进驻贫困村(牧区驻到乡)实施“万村帮扶活动”。加强贫困村村级组织建设，建设一个好班子，选准一条好路子，建立一套好机制。

到 2000 年底，四川省农村贫困人口由 1993 年的 877 万人(不含重庆)下降到 161 万人(不含返贫人口、新增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由 12.70% 下降到 2.30% 以下，如期实现了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到 2000 年底基本解决全省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 四川党史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9·3”重要讲话精神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座谈会综述



**编者按：**9月7日，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联合主办的“四川党史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9·3’重要讲话精神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座谈会”在成都召开。四川党史界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各市（州）党史部门负责人、入选论文代表及受邀参会的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代表近百人参加了此次座谈会，15位专家学者作了专题发言。本刊将此次座谈会主要内容及发言观点摘编如下，供读者学习参考。

### 一、关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9.3”讲话精神

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9.3”重要讲话始终贯穿着“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这样一条红线。这不仅是今年系列纪念活动的主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待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科学态度，是抗战史研究的纲。

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承先结合党史工作指出，“9.3”讲话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把历史当作最好的教科书、营养剂和清醒剂，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思想自觉。作为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既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弘扬

抗战精神的需要，也是坚持科学历史观推进深化抗战历史研究和资政育人的需要。

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巡视员汪毅指出，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发表了两个讲话：一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二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这两个讲话囊括了中共党史的重要部分，也囊括了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具有真理性、民族性、世界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中国人民抗战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的重要精神财富，体现了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的表述和认知，为广大史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副院长、教授田永秀认

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的宏观角度，总结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讲话简短精练，视野更广、立场更高、立意更为深远。习总书记站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从世界和平发展的宏观视角，来定位、定性中国的抗日战争的地位和贡献，这一讲话必将促进世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新的评价。

## 二、关于抗战时期四川党组织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四川党组织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帮助下，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四川地区抗战大后方的特殊情况，开展大量的工作，获得了较大的恢复发展，为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与会者对四川党组织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点研讨。

王承先认为，抗日战争中，身处抗战大后方的中共四川组织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南方局的直接指挥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领全川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四川各级党组织在建立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川军停止内战、出川抗日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和影响作用。

省档案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亚夫认为，中共四川组织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紧紧依靠四川人民，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壮大党的队伍，强化组织领导，加强上层统战，争取四川地方实力派，推动川军出川抗战，坚持团结抗战，开展人民民主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友平认为，抗战时期，四川党组织的建设与党各项工作的全面推进，使其成为四川抗战的重要力量，同时也为党组织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各方面的基础和条件。中共四川党组织成为抗日救亡团体的领导核心，特别是四川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全国十分突出。中共四川组

织还派人深入国民党领导、川军中下层官兵中积极宣传动员抗日，对川军抗战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与会专家还认为，必须正确认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四川大学党委宣传部长、教授高中伟认为，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中国抗战的真实历史却被一些人歪曲、抹杀、割裂和否定，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直接关系到我国立党立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问题。党史工作者需要加强研究，去帮助民众澄清认识。一方面对国民党战场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十分必要，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容抹杀：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夺取抗战胜利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的作用日益突出是坚持抗战的军事保证，共产党认识和把握抗战规律是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思想保证，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奠定了抗日战争人民胜利结局的组织保证。

## 三、关于四川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及四川人民为抗战作出的贡献

四川作为战时中国的大本营，不仅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也是中国战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中心，更是中国抗战主要兵源、粮源供给地，是战时中国各项军需、民用物资生产的重要基地。四川人民义无反顾，慷慨赴难，对全国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成都军区政治部编研部部长黄胜楷认为，四川在抗战中地位重要、贡献突出，具有反日热情高的政治优势，动员潜力大的社会优势，生产条件好的经济优势，攘外人心齐的人文优势，在布局战局全局上对抗战提供了巨大支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为抗日战争提供了重大支撑，在参战作战支战上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强大支援。

王承先认为，四川作为中国抗战最重要的大后方，不仅是国民政府战时首都所在地，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指挥部。四川人民为抗战作出的贡献和牺牲相当巨大，是八年抗战期间出兵最

多、出钱最多、出物最多、出力最多的省份。在敌后战场，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川籍英豪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直接奔赴抗日前线参加对日作战，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这些川籍共产党高级将领，率部不畏强暴、奋勇拼杀，直至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川籍共产党人中，还涌现出了许多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抗日革命英烈，赵一曼、陈修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罗亚夫认为，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巨大历史贡献和牺牲。以朱德、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陈毅等为代表的无数川籍共产党人在各个地方、各条战线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四川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贫富贵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的伟大洪流，从精神上、物质上全面支援了全国抗战。

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吉成认为，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作“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演讲，正式确定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的驻地。大批机关、工厂、学校、文化单位西迁入川，四川一时成为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镇，成为中国抗战的复兴基地、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同时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交汇点，四川为抗战的胜利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巨大贡献。

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玫指出，在14年抗日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虽然没有踏入四川的土地，但是四川人民同样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四川人民义无反顾投入全力投入抗战之中，四川作为大后方，担负起繁重的支援前线的重任，八年全面抗战，共承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同时40万优秀四川儿女出川作战，20万人血洒疆场。四川军民在抗日战争中伟民族解放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永载史册。

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谭晓钟回顾了川军出川抗战的悲壮历史。他指出，抗日战争爆发后，川军的民族意识得到唤醒，在川军爱国将领

的带领下义无反顾的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分民族，不分信仰，不分党派，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而英勇斗争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川军将士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为全民族抗战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

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姜继洪回顾了抗战中后期，川南中共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开展以统一战线为核心的地下隐蔽斗争，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的历史，指出密切联系群众和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川南中共地下党组织能够打击敌人、教育人民，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策略。

## 四、关于伟大的抗战精神、抗战胜利的经验及其现实启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择点。伟大的抗战精神，是矗立在这一历史转择点的精神丰碑。

罗亚夫认为，我们必须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和高度的行动自觉，充分认识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弘扬抗战精神，勿忘国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决维护党的权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形象，在坚定理想信念中弘扬抗战精神。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当前深入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为载体，融入抗战精神的时代内涵，找准修身、律己、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和不足，促进干部作风进一步转变，在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弘扬抗战精神。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朱华认为，抗战的胜利是伟大抗战精神的胜利。抗战精神是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百折不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弘扬抗战精神有

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落实“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同时抗战精神也是实现祖国统一的精神纽带。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场战争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值得总结和汲取。

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唐永进认为，“人民至上”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人民至上”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实践。习近平总书记“9.3”讲话的第一句是“全国同胞们”，最后一句是“人民必胜”，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在当前全国亿万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团结奋斗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应该一如既往地“把人民至上”作为指引、评价、检验自己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五、关于下一步开展抗战历史研究相关问题

与会者认为，四川抗战历史的研究通过几十年党史部门、高等院校、社科研究机构等单位广大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发表、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但仍存在研究不深的问题。

王承先认为，要重点加强四川抗战史研究，要具有世界视野，不仅要把中国抗战放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去研究，也要把四川抗战放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要重点研究四川在全国抗战及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和地位、四川作为中共统一战线策略成功实践地的历史经验、中共四川组织与四川对抗战胜利所作贡献的关系等问题。要大力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战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丰富的营养剂和清醒剂，为四川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美好未来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汪毅认为，川人的抗战是中华抗战史最重要的

一章之一，川人的抗战史在中华抗战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理论研究的一笔重要财富。无论是从党史，还是地方志、地方史的角度，都有非常广阔的研究视野，全省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应该整合资源，进一步加强对四川抗战史的研究。

罗亚夫认为，史学工作者应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让历史说话，用档案发言，扎实开展抗战档案资料的整理，深入开展抗战档案专题研究，系统推进抗战档案主题宣传，用好用活抗战档案这一宝贵的历史资源，在传承发展红色文化中弘扬抗战精神，为在新的起点上，努力实施“三大发展战略”，奋力推进“两个跨越”做出积极贡献。

省直机关党校党建党史教研部教授魏敏生指出，自己多年来讲授党史党建课程，许多学员特别是老同志反映：你讲的很多内容我们都不知道，至于年轻人可能对这些历史就更不清楚了。这让人感到党史工作者责任非常重大，党史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自觉加强党史宣传教育，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好地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田永秀认为，四川对抗战战争的胜利居功至伟，在抗战时期就被各界认为是抗战复兴的基地。关于四川对抗战战争的贡献，在学者们的研究下取得了很突出的成绩。但是对抗战时期四川百姓的关注似乎不够。希望能深入地研究抗战时期四川百姓如何与外来民众和平相处，如何克服各种生活困难默默支撑抗战等，这是深入剖析四川对抗战贡献的重要问题，也是铭记历史、发扬抗战精神的重要环节。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黄天华建议，对抗战时期参加抗日战争的普通川籍士兵以及以朱德，邓小平为代表的川籍高级将领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四川的实际运作情况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同时更充分恰当地利用其他党派（如国民党）的史料，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不仅仅要研究“7.7”事变后全面抗战的历史，还要研究从“9.18”事变开始14年的抗战历史。要整合全省的研究力量，争取作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供稿：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执笔：黄婷婷）

## 红色之旅·巴中市通江县

通江县位于四川省巴中市东北部，米仓山东段南麓大巴山缺口处，幅员4116.58平方公里。通江县东接万源市，南邻平昌县，西靠巴州、南江二区县，北连陕西省南郑、西乡、镇巴三县，有“川陕苏区首府”“中国红军之乡”“中国银耳之乡”“中国溶洞之乡”的称号。

红色  
景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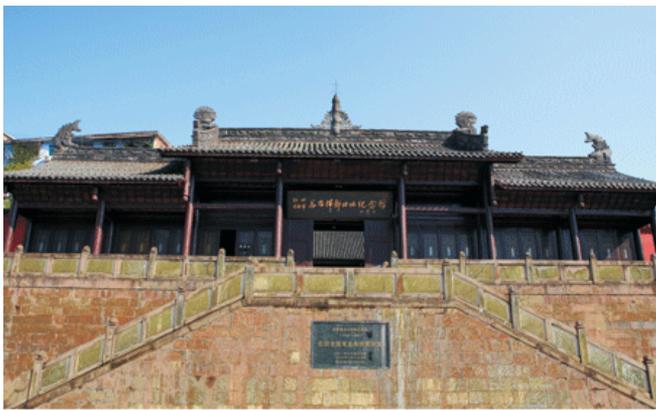
###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位于通江县城文庙街29号。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总指挥部设在通江县城文庙内，一直到1935年春。在此期间，徐向前等指挥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地方武装、广大群众以通江为依托，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和“六路围剿”，成功进行了多次战役，同时加强根据地各方面建设，使川陕根据地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区域，红军发展到8万多人。

旧址系明代建筑，保存完好，占地2500平方米。1982年辟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陈列馆，1992年更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主题陈列展《巴山烽火》分为5个部分11个展室，辅之以图表模型、沙盘景厢，真实再现了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史实。

纪念馆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

###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位于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

1933年12月至1934年12月，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迁至王坪村，接收治疗前线运回的重伤病员，因战事频繁，缺医少药，很多经抢救无效牺牲的伤病员，均被安葬在总医院王坪村周围。为缅怀革命烈士，决定在总医院旁修建烈士墓。墓碑由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设计、绘图并写碑文。主墓区（集墓）安葬红军烈士7823名，系当时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墓。

1985年扩建为红四方面军王坪烈士陵园，2002年陵园更名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2012年修缮新建了无名烈士纪念园、“铁血丹心”广场、千秋大道等，迁入通江县内散葬烈士17225名，现共安葬25048名烈士。陵园核心区域扩大到350亩。

该烈士陵园现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牌坊。



“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纪念碑。



无名烈士墓群呈扇形排列，17225位散葬的无名烈士集中迁葬于此。

红军石刻标语

通江县境内的红军石刻标语遍布城乡，举目皆是，“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保存之完整，为根据地各县（市）之冠”。

红四方面军在创建和巩固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期间，为了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组织群众和震慑敌人，在通江境内书写篆刻了大量的石刻标语。全县74个乡（镇）均有分布，其中沙溪、至诚、诺江、毛浴、芝苞、杨柏、板凳等乡（镇）的红军石刻标语最为宏大，最为集中，最为完整。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赤化全川”和“平分土地”是最大的红军石刻标语。



红军入川第一镇——两河口乡

两河口乡位于通江县北部，南距县城90公里，东接镇巴县，西靠会家乡，南临长坪乡，北抵空山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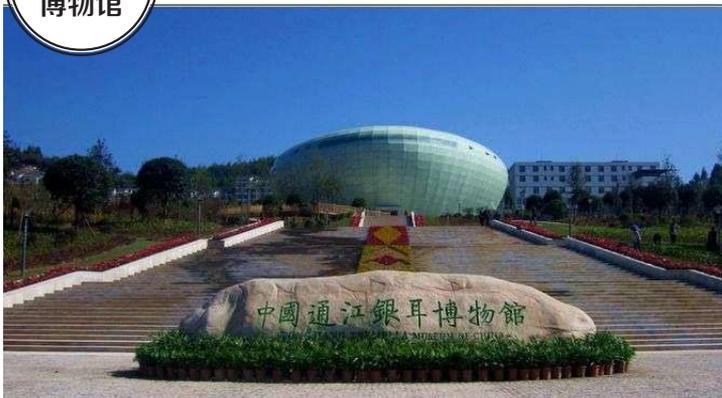
1932年12月17日凌晨，红73师217团（先遣队）在团长洪美田、政委闻盛世的率领下，从陕南西乡出发，经两天急行军，翻越“巴山天险”，12月18日占领川陕边陲通江境内两河口，守敌1个连闻讯逃窜。红军大部队随即抵达。主力部队于21日进至泥溪场，正式提出：“红军停止转移，在川北创造根据地”的口号，即在泥溪场建立苏维埃政权，制定了分兵向通江、南江、巴中发展的计划，为后来的根据地扩展奠定了基础。



景点链接

银耳博物馆位于通江县高明新区，于2014年正式对外开放，占地40050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分“主馆”、“生态景观”、“文化广场”。主馆外形如同一颗巨大的露珠，取意“天生雾、雾生露、露生耳”，由“天赐”、“地孕”、“人文”、“和合”、“神效”、“乐享”、“品鉴”七大展区及3D数字影院组成。博物馆集收藏、研究、展示、宣教、科普于一体，全面展示通江银耳独特的文化底蕴和中国银耳之乡厚重的历史内涵，是一座银耳文化博物馆和科技博物馆。

通江银耳博物馆



诺水河风景名胜区



诺水河风景名胜区位于通江县北部，面积525平方公里。景区分诺水洞天、临江丽峡、空山天盆三大独立景区，以山青、水秀、洞奇、石美为主要特色。景区可观点达300余处，有溶洞128个，不同风采的险滩、碧潭300余处，各类瀑布、暗流、喷泉、水帘100余处，尤以莲花潭、老龙泉、风泉、鱼泉、变色泉最为奇特。这里溶岩地貌千姿百态，有“石人”、“石马”、“石狮”、“石猴”等。景区内溶洞沿河岸成群分布，现探明的有牛角嵌、狮子洞、仙人洞、宋家洞、中峰洞等处。诺水河风景名胜区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 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

文/宋升堂



编者按：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省委组织部于今年8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工作。在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宋升堂按照省委组织部要求，主动申请赴广安市广安区兴平镇龙孔村担任第一书记。两个月来，他白天工作，晚上记录《扶贫日记》。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走出农村当兵十多年，转业后很幸运地在成都谋得职位，脱离了农村。看惯了都市的繁华后，心底又谋生“好想再到农村去，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想法，是精准扶贫圆了自己的梦。

10月22日，晴。

时间过得真快，到龙孔村担任第一书记已两个多月了，一切都在忙碌中度过，累是累点，却感到特别充实。今天得把村民的几个具体的事解决妥当，怕以后无暇顾及。

村民杨正芬家是我来龙孔村，经过精准识别后确定的贫困户，别看她家房子不错，但收入微薄，仅靠她丈夫在外打工，每月千把块钱的收入维持生计。她的公婆体弱多病，两个女儿一个读大学，一个上高中，面临辍学的危险。其困难情况在我上报后，省委党史研究室决定资助她家助学金5000元。

与我交谈，杨正芬一家人再也没有了过去的愁容，我心里挺感动。说实话，7月份我到龙孔村，普遍发现这里村民精神状态不好，因此，在每次走访中，我都要用“房前屋后扫干净，脱贫需要精气神”这句话来鼓励他们，短短的两个多月过去了，村民的变化不小，脸上笑容增多了。

还得赶紧把身份证送给黄大菊老人，老人腿脚不便，当初她想独自去镇上补办身份证，我放心不下，就给她代办了身份证。在去黄大菊家的路上，遇到村民朱心宇，他说给龙孔村8组修路的铺路石解决了，我一下轻松了很多。

黄大菊老人就住在八组的老院子里，我把身份证送给她，老人非常高兴，给我连声道谢。

住在老院子的村民见到我很亲热，向我反应各方面的情况。我来这里很多次了，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听到村民开玩笑说，龙孔村有八个组，而这个院子是龙孔九组，被人遗忘了，公路不通，连便民路也没有，这给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当第一书记以来，一直在想办法给八组修条路，经过努力，修路的资金和施工队伍都到位了，但材料运不进，开不了工，原因就在八组村民黄万伦身上，他不允许运输材料从他房前过，村干部多次去做工作，他就是不干，得再次去做他的思想工作。黄万伦性格很倔，八组村民都不愿意与他打交道。我与他深入交谈，了解了问题症结所在，并协商好解决办法。

解决了黄万伦修院坝的问题，他也爽快的答应我们的请求，八组修路就可以马上开工了，我心头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接下来的精力要转向产业基地建设上，龙孔村在上级的帮助下，变化很大，村里田调型完成200多亩，土调形完成300多亩，我们正引导村民抓紧把油菜种下去。尽快在坡地上把晚熟的柚子种下去。

看到村民个个充满干劲，我心里由衷的高兴，觉得当初写申请下乡当第一书记写对了，觉得这里的群众需要我，他们非常信任我，感到自己也充满着力量，能尽心尽力的把村里面的事干好。

我这个“农村娃”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土地，抛开了城市的喧嚣，摒弃了人生的浮华，呼吸着带着泥土芳香的空气，忙碌在田间地头，心情是多么的舒畅。也找到了我爱看农村题材的电视剧，特别是《马向阳下乡记》的思想根源，那就是我深深眷恋着农村这片土地，哪里有我的父老乡亲！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广安市广安区光平镇龙孔村支部）

## » 大型画册丛书《图说长征》课题工作协调会在京召开

8月3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大型画册丛书《图说长征》课题工作协调会在北京召开，红军长征经过地相关省（区、市）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同志到会并作动员讲话。

曲青山主任要求参加课题的每位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做好《图说长征》课题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课题的主题和内容，齐心协力、保质保量的完成好课题。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蒋建农同志宣读《〈图说长征〉工作方案》后，贵州、湖南、四川、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牵头负责分卷课题的情况。

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承先作为《图说长征（红四方面军卷）》的牵头省领导，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他首先通报了红四方面军卷的工作方案、课题基本架构和人员配备等情况，并就编写提纲各个板块基本情况作了介绍，就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与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其他兄弟省市党史部门负责同志进行了探讨。最后，王承先主任表示，一定按照曲青山主任讲话精神和一部的要求，集合本室力量和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的资源，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深入调研、认真选材，按照课题要求，争取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完成红四方面军卷的初稿编辑工作，并配合做好红一方面军卷和红二方面军卷涉及四川方面工作。

## » 全国党史期刊编辑培训班在京举办

10月19-24日，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宣教局和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组织的全国党史期刊编辑培训班在北京开班。来自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副省级城市党史报刊的55位学员参加了培训。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高永中出席开班式并作《以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重要论述为指导 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党史期刊工作》的主题报告。报告立意高远，主题明确，对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的13个方面的解读，介绍了十八大以来全国党史期刊取得的新成绩和当前期刊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并对进一步做好党史期刊工作提出了要求。

在为期五天的培训中，学员们聆听了北京大学学报

龙协涛教授《编辑的人文素养、学术眼光、职业境界与编校质量》、南京大学沈阳教授《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修订的情况简介》、中国社科院李志江副编审《语言文字规范与报刊编校质量》、北京大学詹卫东教授《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解读》、中宣部出版局刘建生编审《出版人的定力》等课程，并进行了两次全班交流，一次是有关政治把关和选题策划，由《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王素莉主编、高远戎副主编，《红广角》杂志吕湛忠主编和上海《党史信息报》副总编晏蔚青主讲，全班同学参与讨论；一次是就办刊编刊过程中的经验体会和遇到的困惑问题进行探讨。

## »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文星赴四川大学开设党史教育国情讲座

10月23日下午，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文星到四川大学江安校区为文学与新闻学院学生讲授党的历史。李文星以《巅峰对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为题，从“大势、人心、组织、领袖”四个维度提出“谁最能解决国家根本问题、谁最能凝聚绝大多数群众、谁最能激发出最强大力量、谁最具有战略力和领导力”四个核心问题，引经据典、列举大量事实，对国共双方的政策纲领、力量结构、组织方式和蒋介石、毛泽东的性格特点、思维方式、领导艺术、指挥作战风格及团队特点进行深入分析，讲述了抗战胜利后看起来十分强大的国民党政权为什么短短三四年的时间就被中国共产党所打败，最后得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结论。

今年以来，省委党史研究室积极谋划深入开展“党史七进”活动，推动党史“进机关、进学校、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军营、进网络”。作为“党史进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省委党史研究室与部分高校合作开展党史宣讲，推动党史教育进高校，引导广大青年尤其是学生深入学习党的历史、正确认识党的历史、真心热爱党的历史。同时积极开展面向社会各界的党史宣传教育，8月21日，李文星副主任以“家国情怀”为主题，为香港政协青年联合会“四川旅学团”讲述了四川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和贡献及川籍共产党人在抗战中的感人事迹，进一步加深他们对抗战历史的认识和对祖国的认同。

### » 全省各市(州)党史界积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9·3”重要讲话精神

9月8日,德阳党史界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9·3”重要讲话精神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座谈会。各县(市、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党史学会部分理事、专家,部分入选论文作者和市委党史研究室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议。

9月8日,乐山党史系统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9·3”重要讲话精神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座谈会。各县(市、区)党史研究室主任、乐山抗战史研究专家、退休老同志代表、入选论文作者和市委党史研究室全体干部职工参加座谈会。

9月11日,攀枝花党史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9·3”重要讲话精神暨座谈会举行。与会领导、专家就抗日战争的历史、学习心得等方面进行了交流探讨。

9月11日,遂宁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市委党史研究室全体人员及县(区)党史研究室主任和有关党史专家参加会议,并交流发言。

广元、绵阳、巴中、自贡等地市委党史研究室专题召开了全体干部职工大会。

全省各地党史系统以各种方式,积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学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明同志在四川省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学习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承先同志在四川党史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9·3”重要讲话精神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并邀请各地专家学者展开交流活动。

### » 广元市委书记马华同志对党史工作作出批示,肯定市委党史研究室今年以来取得的显著成绩

9月15日,中共广元市委书记马华同志在《市委党史研究室2015年党史工作推进情况汇报》材料上,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市委党史办今年的工作既突出了重点,又整体推进,各项工作成效明显,令人高兴。望继续保持这股劲头,抓住重点抓出特色,使我市党

史研究多出成果,再创佳绩。”

今年以来,中共广元市委党史研究室在新领导班子的强力带领下,多项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取得了巨大成绩:一是党史著作编纂有序推进。已经出版发行了3本基本著作(或画册);另有4本基本著作的编撰工作正在高效推进。二是党史资料征集富有成效,征集各类图片3300多张,各类文字材料350余万字。三是党史成果转化和党史宣传教育工作开创新局。高规格成功举办“党史光芒照耀未来—广元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党史图片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四川党史文献网、四川党的建设、广元时报等平台和多层次、全视角党史宣传工作;同时,扎实开展党史“七进”活动,在广元四大主流媒体开设《历史上的今天》专栏,举办全市庆“七一”党史知识竞赛。

中共广元市委十分重视党史工作。今年以来,中共广元市委书记马华,市长、市委副书记王菲,市委副书记邹自瑾,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冯磊等市委领导已10余次对党史工作作出高度批示,并将党史工作列入市委常委会内容进行专题讨论。

### » 《赵一曼图录》正式出版发行

由中共宜宾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公室)、宜宾市文广新局、宜宾市教体局、宜宾市旅外局、宜宾市赵一曼纪念馆共同编纂完成的《赵一曼图录》由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

全书将赵一曼的一生浓缩为42个碎片化单元,由11个专题统领,再按历史发展轨迹对11个专题进行逻辑排列,所有专题与单元名称,以中文和英文双语的形式进行表达;版式设计以视觉冲击力为切入点,做到震撼与欣赏性兼具。

该书于今年9月首发,按照党史成果“进机关、进院校、进企业、进军营、进社区、进旅游”的要求,广泛发往机关单位、工矿企业、驻军与武警连队、基点校以上教育机构、乡(镇)文化站、社区书屋、旅游景区和旅游酒店,作为全市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爱国主义教材。同时,本书成为全省党史教育基地的教育读本;新华出版社作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推荐出版物,向中直机关、国家级研究机构和国家级纪念馆推荐与发送。

##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 金冲及应邀来川作专题辅导报告

9月7日下午，应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邀请，著名党史专家、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先生在成都为全省党史系统干部职工及相关部门、高校从事党史研究的同志作题为“治学的基本功”的专题辅导报告。金老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治学经验，就从事史学研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用深入浅出、幽默风趣的语言分享了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

金老在报告中指出，从事史学研究必须要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勤学苦练基本功：一是知识面要广、要扎实可靠。读书要有目的性、针对性和系统性，有所选择和侧重。要注意对所学知识进行系统化整理、条理化整理。二是要培养思考和分析的能力。查阅相关资料时必须善于联想和理解，要有想象力，能从众多资料中发现其规律性，形成自己的思路。要养成问题意识，善于在查阅材料过程中不断提出问题。在确定选题时要充分考虑自身的资料准备情况和驾驭能力，不要好高骛远。三是要提高文字功夫。在写作过程中要时时处处站在读者的角度和立场，注意文章的谋篇布局和起承转合



要紧扣主题，语言要有感情，用词要恰到好处，提高文章的可读性和吸引力。金老总结说，作为史学研究部门单位，工作搞得好不好靠两点：一要出成果，二要出人才，最根本的是要出人才。人才的培养既要靠组织发现和培养，但更重要的是靠自身的努力，希望党史工作者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科学总结自己的研究和分析方法，切实提高治学水平。

(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一处)

## 四川党史界抗战系列书籍在蓉首发



9月7日，由省委党史研究室牵头编撰的《四川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抗战时期的中共四川组织》、《抗日英烈陈修文》3本抗战系列书籍在成都首发，为研究我省抗战时期的地方党史增添了一批史料精品。



雅安石棉安顺场今貌